帝国与共和：中国命运的两种抉择——李慎之先生逝世七周年祭（上）

王康

自《诗经·大雅》集录“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八字，中国作为地域、文明与民族共同体之称谓，已逾五千载。

即以周（真公）共和元年（公元前 841 年）计，距今也近三千年，“新中国”（1949－2009）仅约为其五十分之一而已。

太史公两千多年前就曾自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宋儒张横渠一千余年前也曾自诩：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今人切勿甘为此短暂时世之形象代言人。

我们必须贯通地超宿命地以全球性历史视野为当下中国扫瞄，不如此无以奢谈“中国形象”或“中国使命”。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四千年大梦之唤醒”（梁启超），无疑是近世中国命运与使命最无奈、最英勇、最悚惕的咒语式警示，也是世界历

史从未面临的特异悬案。

粗略估算，已逾十代国人六十余亿人次身陷此一大变局、大觉醒，中国近两百年的全部心智、骨血和神髓，几乎悉数耗散于此亘古未有之解析、应对之中。各种迹象表明，中国即将突破这一变局，终结这一大梦，但是中国究竟何去何从，却远未尘埃落定，中国何去何从，仍然是未定之数，——中国同时成为自身和世界的共同负担、共同责任。

"这全人类四分之一这生命与精神，何处寄托，如何安顿，实际上早已为全人类的共同良心所关切。中国问题早已化为世界的问题。如果人类的良心，并不容许用原子弹来消灭中国五亿以上的人口，则此近四分之一的人类生命与精神之命运，便将永成为全人类良心上共同的负担。"（《中国文化与世界——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认识》，唐君毅：《谈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四先生当年发表此《现代新儒家宣言》前后，中国在"冷战"外患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内忧中，迭经专制、独裁、贫穷和饥馑，并且与几乎整个西方（包括苏俄、日本）为敌。中国一度似乎又回到谭嗣同眼中"黑暗否塞，无复人理"之人间地狱：世间无物抵春愁，合问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五十年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变，困扰世界的冷战和核战阴云大幅消褪，笼罩中国的历史浩劫如烟散去。而中国之命运，仍然没有得到真正厘清，中

国何去何从的历史叩问，仍然不是一个历史定论。中国仍然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的使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需要我们以更为忧患、庄严和苍茫的心情面对。

中国从来就是一种世界力量。

自古以来，中国横亘在世界上最浩瀚的海洋和最雄伟的山峰之间，上苍赐予的这片时空悠久、辽远而闭塞，天然自成一个世界。在人类各民族被自然屏障分隔的漫长史前时期，中国拥有的优势十分显明，地理、气候、自然和周边环境都足以支持中国发展出独特而成熟的文明。当欧洲在异族入侵的黑暗帷幕和中世纪蒙昧主义的千年岁月中分崩离析和踯躅不前时，中国已经“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技术上，曾经领导了世界达两千年之久”。（[美]罗兹?墨菲：《亚洲史》）

作为最巨大、古老的文明，中国原本可以遵循东方农耕社会的固有节律和亚细亚大帝国的权力结构，在自我封闭、停滞、循环往复的王朝兴衰周期率支配下，代代因袭，自治而沉迷地生息绵延，终古不变，——中国文明遵循着某种天造地设般的“宇宙－自然原理”：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是天然的永久性大国，其历史、文明、人口、土地、资源都注定了它那非同寻常的命运，中国又是注定历经曲折，必须缴付高昂代价才可望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大国。

五百年以来、次第出现、先后相续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大革命，不仅使欧洲的历史发生了突破和革新，而且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世界。它们似乎禀承着另种“天意”，不可遏制地向一切文明和一切民族进发，它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第一次宣称自己属于并代表全人类，破天荒地以某种普遍有效、普遍适用的的普适价值的名义，以征服和救赎世界为己任，其秘密是：价值、利润、市场；其工具是：科学、技术、贸易；其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其目标是：人类、世界、宇宙；其边界是：无限、永恒和终极真理。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位移，中国不再是“中央之国”，礼仪之邦，中国成为世界文明的边缘地带，中国文明沦为最古旧、不开化、半野蛮的化外之物，成为西方文明觊觎扩张的最后疆域，也是西方最难理喻、最难充塞的神秘帝国。中国的固有优势和传统精华，遭到严厉的审视和置疑，中国的独特命运，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影响和前途，都必须由中国并不熟悉和快意的语词、逻辑和法则来分析判断。这究竟是中国的福份还是祸端，世界的吉兆还是凶像，尚无人洞悉。

“君子反求诸己”，“认识你自己”，东西方古代哲人的不朽告诫，神意地适用于今代中国。没有一个民族能够悖离天地间的常情，每一个民族都领受着某种天命，按其内在本性，在人类历史舞台上充任天定角色。极而言之，上帝垂青或厌恶某个民族，成全它走向荣耀和拯救还是任其堕入深渊，必先促其反躬自省，必先促进接受庄严的精神洗礼。

古希腊水手在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赤克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遥望东方时，曾发明过两个极富启示性的时空概念：亚细亚，太阳升起之所在；欧罗巴，夕阳西下夜幕降临的一刹那。自从荷马、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关于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把希腊与波斯的世代血仇引入后，“欧罗巴”、“亚细亚”就开始转意为历史、种族和宗教名词，成为划分文明与野蛮、区隔光明与黑暗、代表自由与奴役的世界历史分野。两千年后，黑格尔从中获得灵感，形成他那影响深远的历史哲学：东方只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腊与罗马世界知道若干者自由，惟有日尔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他以罕见的诗体语言断定，世界历史有一个神意的绝对起点，那就是亚细亚。当那轮自然的外界的物质的太阳从东方升起并在西方没落时，那轮精神的主观的自由的太阳也就从西方升起，散播出一种真正高贵神圣永恒的光辉，人类的崇高使命和最终目标从此指向西方，而东方和全部非西方民族都将长久地笼罩在历史黑暗地区，直到世界精神的破晓时分神恩般地普降寰宇。

按照西方的观点，东方最神秘最反常最可悲的特点，在于它那周而复始的循环史观。无论如何改朝换代，治乱兴亡，东方都以万变不离其宗的超然与孤寂，演绎着一个“停滞社会”的全部符咒。

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理查德?琼斯、黑格尔、马克斯?韦伯……西方的智者都有以讶异而矜悯的目光注视着东方，断言亚洲总是大帝国的家园，专制主义的温床，暴君的老巢，人类不幸和黑暗的舞台。一种奴隶精神统治着亚洲，并且从来没有离开过。在亚洲大陆全部历史中，从来找不到自由精神的痕迹，只有规模庞大、耸然而立的专制帝国。暴君是唯一的主宰，全体臣民都是他的奴俾，这种普遍绝对的隶属依附关系，构成了东方世界野蛮统治牢不可破的历史基础，构成亚洲各国始终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平陂往复周期性地震荡－

沉寂的唯一动因，并由此滋生出这个历史未破晓地区的全部精神结构：暴力、谎言、虚伪、奸诈、告密、鬼谲、迷信、腐败、权争、无道……

至于中国，它可悲地被海洋、高山和沙漠环绕隔绝这一地理事实，同时象征着它在精神上的封闭、孤立、静止。一种终古不易的腐朽气息化解了一切新鲜事物和创造精神。德国历史学家赫尔德在十八世纪末写下的这段话，可视为欧洲对中国的经典评点：

几千年来，中国始终停滞不前。他们那些关于道德和法令的教诲总是反反复复，变着腔调在同一个话题上兜圈子，千篇一律地颂扬一种孩童式的义务。他们的天文学、音乐、诗歌、兵法、绘画和建筑与千万年前一样，不过是他们永恒法令和千古不变的幼稚滑稽的政体的孩子。中国恰如一具木乃伊，周身涂着陈腐的香料，描画着象形文字，包裹着丝绸，它体内的血液循环早已停止，犹如冬眠的鳖类，它对一切外来事物都采取敌视、窥测、阻抗的态度，它对外部世界既不了解，也无兴趣，更不喜欢，它的最高旨意就是终日沉浸在自我封闭的漫长黑暗之中。①

中国精神及其外在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它拒绝“精神”，尤其缺乏建立“内在”精神的天然能力，因此无法从生命本体上建立自由所需要的基础，黑格尔对中国文化的绝望与他关于世界精神和精神辩证法的理论通过马克思－列宁传输到中国之间，乃是西方精神对中国最奇特的胜利：

凡是属于“精神”的一切——在实际上和理论上，绝对没有束缚的伦常、道德、情绪，内在的“宗教”、“科学”和真正的“艺术”——一概都离他们很远。皇帝对于人民说话，始终带有尊严和慈父般的仁爱和温柔，可是人民却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逼他们掉到水深火热中去的生活的担子，他们看作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卖身为奴，吃口奴隶的苦饭，他们也不以为可怕。因为复仇而作的自杀，以及婴孩的遗弃，乃是普通的甚至每天的常事，这就表示中国人把个人自己和人类一般都看得是怎么轻微。虽然没有因为出生门第而起的差别，虽然人人能够得到最高的尊荣，这种平等却适足以证明没有对于内在的个人作胜利的拥护，而只有一种顺服听命的意识。②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纯西方式历史文献中，马克思、恩格斯在预言西方资本主义必将寿终正寝同时，盛赞“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他们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不存在土地私有制，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基础。他们以悲天悯人的情怀写道，从纯粹的人类感情出发，眼看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崩溃、瓦解，无数勤劳善良无辜的普通百姓既丧失了自己的古老文明，又丧失了世代相传的谋生手艺，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但是不应忘记，正是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和老实巴交的农民初看起来怎么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统治的牢固根基；它们使中国人的头脑局限在狭小的时空中，沦为暴政的驯服工具，表现不出任何独立意志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中国这个“活化石”，世界上最古老的

“腐朽的半文明制度”往它的人民中灌输的全部教训都是“因因相袭的愚昧”。作为“欧洲的直接对立面”，欧洲文明的“反题”，中国代表着世界上“总体反动、总体保守的强大堡垒”，乃是“腐朽世界的总代表”。

作为西方文明的叛逆和异端，马克思、恩格斯与西方主流学者对中国的分析始终有某种微妙的差异，就是这种差异，也许成为他们的学说在其去世六、七十年后，在遥远陌生的东方被奉为天条的原因。他们同样厌恶并看到“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中国这个悉心“保存在密封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旦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而西方资产阶级天然“负有为新世纪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就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支持下对自然力的统治。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与拿破仑、威廉二世和尼古拉二世等西方人一样，马克思、恩格斯朦胧地预感到东方的中国这条不祥的“恶龙”和“睡狮”将会从历史的沿船和迷雾中醒来并徘徊于世界上空，他们怀着某种模糊、复杂、有几分庆幸又夹杂着恐怖的心情，隐略看到了某种前景，“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但是欧洲切勿高兴过早，这只是事情的开端，西方将会欣赏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复兴”。马克思、恩格斯据此对世界历史辩证发展的第三阶段做出了所有资产阶级都未曾做出的另类预言：西方（首先是英国）出于卑鄙的商业利益，却造成了亚洲前所未有的社会革命，英国由此“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到时候西方人就无权像“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斥责

中国人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西方可以抗议说，这种战争带有东方落后国家”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为、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可是它就是人民战争。而对于起义民族在其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西方不要指望能根据“正规作战方法或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只能根据这个造反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马、恩大胆地预言，中国的造反和起义“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世界，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将会迎来一个奇怪的后果：中国将引发西方世界的动乱”。那时，马、恩几乎怀抱着世界末日般的绝望预言，人们只能同歌德一起高唱：

既然痛苦是快乐的源泉，

即又何必因苦难而伤心？

难道不是有无数的生灵，

曾遭到贴木儿的蹂躏！③

列宁追随马克思、恩格斯，对俄罗斯的亚细亚传统抱有真诚而深刻的厌恶和警惕。1902 年他严词批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部党纲中把俄国说成是“封建制度”，也拒绝将普鲁士专制主义与俄罗斯专制主义等量齐观，他认为后者是一种“可诅咒的遗产和可耻的待人方式”，是成吉思汗鞑靼军事专制主义在俄国

统治留下的一个“怪物”——欧洲最反动、落后、愚昧和黑暗的“普遍奴隶制”。列宁长期被一种可怖的前景困扰：通过一场革命夺取政权并实行土地国有化，极有可能出现“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复辟”。他与普列汉诺夫一样，已经朦胧看到了俄国革命的另一种阴郁前景：“俄国历史的车轮将要有力地、非常有力地向后转”，他们都明确地拒绝完全亚细亚式的复辟，即使国家成为全部土地所有者、一切生产管理者的王安石式“改革”，他们坚持“俄国王安石式的计划不会带来任何东西，除了祸害”。俄国人无论如何不能由半亚细亚倒退到完全亚细亚式的黑暗专制，“我们不要中国制度”。

世界历史反复凸显和不断演示的唯一真理是，西方既是东方的征服者（这时西方是入侵者、强盗，邪恶而可恨），又是东方的拯救者（这时西方是施予者、骑士，高尚而可爱）。正如自然界进化历程以及其生命谱系已经并将继续显出的某种秩序和法则一样，牛顿从物质世界和行星运动无限芜杂纷纭的现象中发现了大自然的奥秘，卢梭、康德则“发现了深沉潜藏着的人道的性质，以及人类凭着对它的观察而见证天意的那种隐蔽的法则”。人类乃是天意的不自觉的工具，同时也是天意的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在整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幕隐蔽的计划的实现”，有其普遍的、必然的，不为天使而存、不为魔鬼而亡的内在规律。人类展开和实现天意的过程便是人类自身的历史，便是世界史。因此，由某一种历史工具（民族、国家、阶级、个人）担负起引导世界通向那必然来临的辩证发展阶段，就不仅仅是这种工具的荣耀，而是人类践履天意的使命所在。

五百年以来，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以及嗣后兴起和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两次世界大战、非殖民化运动、热核武器、新技术浪潮、星际开发、全球化时代……，极其清晰地展示了半个千年中人类命

运的基本状态，几乎全盘证实了西方作为世界历史破晓的原创地位和先驱意义，淋漓尽致地演绎着西方与东方之间观照与被观照、启蒙与被启蒙、征服与被征服、拯救与被拯救之间的世界历史关系。在人们可以最直观最便捷地观察和感受到的时空中，这个星球上的物质形态和精神潮流，人类生命的悲剧意识和救赎可能，都纯然出自西方的理念、思维、逻辑、语词、人物和事件。人类全部经验和可能性都被西方文明重新诠释和处理了一番，所有非西方民族的命运和使命都只能归结到这一蒙受天意的历史哲学和精神谱系，才能被赐予一种世界性的价值认同和人类文明意义的编排。

无论“严夷夏之大防”还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全盘西化”、“洋为中用”、“以日为师”、“走俄国人的路”还是“赶英超美”，“和平演变”还是“和平崛起”，警惕“亡我之心”还是主动“与国际接轨”；无论康有为的“公车上书”、严复的《天演论自序》、陈天华的《警世钟》还是光绪帝的《诏定国是》、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总统宣言书》；无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誓师词》、《国民政府对日宣战文告》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论蒋中正的《中国之命运》还是毛泽东的《将革命进行到底》；无论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李大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还是王新命等人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唐君毅、牟宗三等人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季羡林、杨振宁等人的《甲甲文化宣言》，无不有西方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各类文本背景渗透其中。中国犹如一个巨大的舞台，演员、道具、场景都是中国的，编剧和导演却是西方人。孔、老、孟、庄以来，玄奘、张

骞、鉴真、郑和以降，作为人类的重要分支，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一脉，中国的全部时空和环境和整体命运从此全然改观了。

无论西方优越论和欧洲中心主义如何霸道无耻可恶，无论多么令中国震惊、愤懑、屈辱、如丧考妣，无论怎么拒斥、敌对、反抗、不共戴天，也无论以什么名义，以何种方式，以哪股力量，中国都不得不把玩西方式的奇技淫巧，不得不研习西方式的声光电化，购买和制造西方式的尖船利炮（原子弹、氢弹），接受西方式的生活方式，培养西方式的美学趣味，实行西方式的婚姻、财产、法政、税收制度，也不得不输入西方式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及科学、民主、理性精神，还不得不译介以至服膺西方式的历史哲学和世界意识（包括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一言以蔽之，西方发现发明的一切，西方无意推销或恶意强加或善意兜售的一切，西方“己所欲施予人”或“己所不欲而施于人”的一切，从君主立宪到激进革命到共和政体，从无政府主义、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从工业化、城市化到后工业化、信息化……，中国都不得不全部重新演绎一遍（当然是以自己的方式！）。这一切已不可更改地重新塑了中国，构成了现代中国（连这个称谓也是西方式的！）的最大景观。

中国也许是最无奈、最勉强、最痛苦，又是最虔诚、最执着、最急切地遵循西方的引导，最后走向历史破晓时分的东方国家。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在近十代人时间里，成为西方各种主义、学说、思潮、运动、制度的巨大实验场。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北伐东征到国共内战到改革开放，中国所有阶级、民族、党派、军队、地区所有人之间的所有组合，所有对抗，所有改姓换代，与其说是中国人之间的较量厮杀，勿宁说是西方文明、意志和力量在中国此消彼长引发的刺激－反应，甚至直接就是西方（包括苏俄、日本）各种历史哲学

和世界目标的异地抗衡。在地缘上离西方最远，文明类型上最与西方互为异类，最后被西方染指的中国，却成为代价最高、规模最大、地震海啸般文明再造的东方国家，称之为中国五千年、世界五百年未曾有过的大变局，实不为过。

1840 年以来，这一变局的狂烈深巨，其震撼所及，今代中国人不仅可感可闻，而且依然身置其中。历史如此奇妙又如此清晰如此意外又如此完整地次第展开，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千万年间基本寂然不动的中国破天荒第一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刺激，开天辟地以来亿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若干完全陌生、外来、异类的因缘而遭逢不绝如缕的变故，中国第一次进入了一种崭新的历史进程，开始领略一种新的天意。两次鸦片战争直接促发了自强运动，日本明治维新和甲午海战直接引起了维新变法，八国联军不仅与义和团难解难分，而且使满清王朝和两千年专制帝制难以为继，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成为辛亥革命的历史先驱和合法性来源（《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人权宣言》、《独立宣言》的内在渊博源一目了然）；凡尔赛强权政治直接激发了五、四运动，俄国十月革命直接催生了中国共产党，继甲午海战打断了中国上层的近代化进程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又再次打断了中国上层的现代化进程，普鲁士军官团和德国将军曾在北伐、黄埔军校和抗战前期留下身影，而从辛亥革命、北伐、长征到西安事变、重庆谈判、国共内战、韩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布哈林、加拉罕、越飞、米高扬、崔可夫都先后直接过问和参予过中国事务；冷战和韩战不仅延缓了中美接近（直到 1972 年），推迟了中国统一（直到今天），而且急遽恶化了中国国内政治，直接导致了对亲美亲西方知识界的清算，促使中国向苏俄“一边倒”（《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党章》与 1936 年的“斯大林宪法”、1939 年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师承关系也一目了然）；1956 年匈牙利、波兰事件和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秘密报告）成为中国反右运动、庐山会议的直接国际肇因，1969—70 年，勃烈日涅夫－格烈奇科集团对中国实行核打击计划，成为中美建交的真实原因；苏联解体、东欧易帜、冷战结束在中国的刺激－反应是“韬光养晦”……，新技术革命、文明冲突论和全球化时代直接加快了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加入 WTO，

争办奥运会、世博会，“9?11”事件、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硝烟外，中国悄悄地提出了“小康目标”、“和平崛起”、“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中国曾经几度临近（或声称临近）西方式的历史破晓时分。

即使在欧风美雨俄雪排山倒海般东渐、中国内忧外患、瓜分豆剖的年代，中国也曾几度以其特有规模和力量改变着亚洲乃至世界的历史版图。

辛亥革命成功，民国始肇者与西方一道为“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欢呼，中国可望在几十年间走完西方几百年间才走完的现代化道路，西方则将与亚洲最大最文明最稳定的自由国家平等地通商，再也勿需用鸦片和战舰一类丑恶的污物强迫中国打开门户。中国东方最神秘的国度最古老的文明，作为上帝预留给西方的最大的异教徒社会和最大市场，将从此受到西方足够的尊重，四亿中国人将不仅彻底挣脱中国两千多年、尤以明清绝对专制主义为甚的东方专制主义桎梏，而且将取代日本，率领整个亚洲走向约二十代西方人已经享受过的历史破晓后的光明与幸福，孙中山被称为东方的拿破仑、中国的华盛顿。

1911 年辛亥革命（我们即将迎来其 100 周年纪念）爆发，中华民国成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取代自暴秦至蒙元至满清两千多年的专制帝制，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大总统，发布《就职宣言》，誓言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政、财政之统一，对外“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世界渐趋于大同”。各省 38 人组织中国历史第一个临时参议院，制定并颁布中国历史第一部现代国家大法《中华民国临时

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人享有人身、财产、居住及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信、迁徙、信教之自由，享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之权利；蔡元培、魏宸组、宋教仁等人发起《社会改良宣言》宣称：“尚公德、尊人权、贵贱平等，无所骄谄，意志自由，无所徼幸，不以法律所不及而自恣，不以势力所能达而妄行，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教之迷信，期以保持共和国民之人格，而力求进步。是皆共和思想之要素，而人之所同当自勉者也。”

鉴于两千年专制毒害深重，临时政府力倡现代教育，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全面开设修身、国文、数学、博物、理化、法制、经济、手工、图画、韵、体操、外国语教学，更发布《严禁鸦片通令》，号召“各团体讲演诸会，随分劝导，不惮勤劳，务使利害大明，趋就知向，屏绝恶习，共作新民，永雪亚东病夫之耻，长保中夏清明之风”。临时政府成员多为学通中西的大学者，深知中国之根本改造绝非一日之功，最为紧要的是移风易俗，彻底转化中国人由专制、独裁、闭塞、愚昧、贫穷、落后和异族统治造成的丑陋积习。临时政府内务部颁令严禁赌博，“赌博为巧取人财，既背人道主义，尤于现时民生多所妨害，亟应严切禁止，为我共和国民祛除污点”，为彻底铲除等级、尊卑、贵贱之差别，临时政府禁止“大人”、“老爷”、“主子”等旧式称谓，“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称”，临时政府率先垂范，上至大总统，下至普通职员，只领 30 元低薪，以示“一律齐等”，蒙、满等蛮族相袭近千载的跪拜叩头奴才牛马之仪悉数革除，代之鞠躬握手之礼。

孙中山本人更尤重国家现代化之建设，其《建国方略》，对社会、物质、

心理，尤其现代工业作出的极其宏伟而缜密的规划，即今观之，犹使后人叹为观止。孙中山是现代中国最富世界眼光的大政治家，他深知“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构思了一个真正前无古人的宏伟计划，将中国发展置于世界潮流之中，邀请、选择取得中国人民信任的友邦，共同开发中国。“利用战时宏大规模之机器，及完全组织之人工，以助长中国实业之发达，而成我国民一突飞之进步”。从新疆、青藏到东南沿海，从蒙古、东北到渤海湾，从黄河源头到杭州湾，港口、铁路、煤矿、钢铁、水泥、造船、机床、服装、建筑，……把一盘散沙之中国建成高度发达、富强、文明而自由之现代大国。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问孙中山，中国国民革命的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告诉这位俄国人，中国有一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余之思想基础，即承此道统而发扬光大耳。他又多次强调，阶级斗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而是社会进化的病症，马克思是一名“社会病理学家”，而不是“社会生理学家”。中国是患贫，不是患不均，不能用阶级革命来解决一切政治问题，孙中山最后的结论是，中国“师马克思之意犹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中国不能实行俄国苏维埃制度，中国更应实行美国林肯倡导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即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

西方舆论将孙中山与美国总统威尔逊、印度圣雄甘地、土耳其独立运动领袖凯末尔和俄国革命元勋列宁并列为世界“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而孙中山获得“国际声望”之年代最早，其所属民族和文明最悠久、伟大，其理想与影响也必最深长巨大：

孙逸仙所拟订的建议中国方案，超越了欧美美国资本化的垄断制度，直接向一个自由化社会迈进。他所创建的中国方案，能成为第三世界可资借鉴的典范，凭着他伟大的思想体系，孙逸仙当是当代世界公民。④

孙中山的早逝，是现代中国一大悲哀，其《建国方略》如能实行，欧美诸国之经济大萧条未必出现，希特勒主义未必会在德国上台，斯大林主义也未必能在同期成为国际共产运动主流……。历史不假这位现代中国伟大先驱以天年，而其真诚、恢宏的理想永远回响于中国二十世纪历史天空：

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⑤

中国在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抗日战争中，再次成为世界文明的责任性力量。1945 年，中国抗战和世界二战终结。中国在废除全部不平等条约（1943.3），跻身世界四强（开罗会议，1943.11），缔造联合国（1945）后，重新矗立于东方。中国是唯一一个为朝鲜、越南、印度、缅甸等亚洲国家争取独立的世界大国，中国是唯一一个准备对日本实行“直道”和“恕道”的受害者，中国是唯一一个使整个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烙有完全正义、高尚印记的反侵略大

国，中国是最早蒙受战祸最后结束战火最艰难、英勇，受害最巨而斩获最少的东方大国。如果不是中国从 1931 年到 1941 年十年期间苦撑东亚，在 22 次会战，1,117 次战役，38,931 次战斗中以 340 万将士和 3,000 万民众的伤亡作代价，德国和日本完全可能在 1941 年从东西方夹击苏联，如罗斯福所言，东西方法西斯将在埃及会师，世界命运将有不同的结局。

孙中山英年早逝，中国过早结束了一个大有希望的时代，过快进入了由并不具备民族大义和世界意识的党人、军阀、政客，逐鹿天下的时代，这种大不幸实属天意宿命。

中国抗战甫胜，几乎立即转入国共内战，却是历史加诸中国的严苛宿命。如果日本帝国没有在 1944 年贸然发动“一号作战”，以图在中国本土与盟军决战，雅尔塔会议的东方条款就不会公然写进“前门驱豺，后门引狼”的可耻条款，中国就不会那么可悲地被苏、美、英出卖，就不会有 150 万全盘机械化的苏军挥师在欧战结束后日本无条件投降之际挥师中国东北，从而陷中国于二十世纪最惨烈的内战。中国从成成为唯一一个历经 14 年抗战后又走向民族自相残杀的东方战胜国，中国浴血抗战捍卫的神圣领土竟从 1,140 万平方公里减少为 960 万平方公里，中国国际地位没有增加一分，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国和联合国缔约国（而不仅仅是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到今天还只能以结交“亚非拉”贫穷小国、甚至流氓政权为荣，而被拒斥在世界八大“民主化工业国家”大门之外。由“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等国际条约一再认定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主权归属中国的历史事实，非但没有实现，反而成为困扰中国统一、再次招致中国人自相残杀、甚至造成整个亚太地区乃至全体人类走向战争的战缘所在。

中国最大的转向和变异是我们退出战后对日事务的最大内因。最反常、最荒诞、最可悲的后果是，这一场内战直接导致了中美两国反法西斯联盟共同制裁日本的巨大历史契机的流失，中国竟向对中国虎视了几个世纪、侵占了中国三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苏俄“一边倒”，中国从此永远失去以自己不可替代的文明风范改造日本的机缘和责任，只能任由一衣带水的日本按异于中国的哲学和战略重新崛起。在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冷战伊始的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以及所有有关日本战后地位和前途（不可能不涉及中国主权、安全和利益）的场合，中国形单影只，最后连配角的身份都丧失殆尽。

最让三千万亡灵和亿兆活着的中国人深感世事荒唐的，是中国新政权竟然仅仅宥于功利与时世变易而正式放弃了日本六千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放弃战争赔偿，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必须置于另一种世界和历史的尺度下，予以重新叙述和评价，意味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天然神圣性将被后起和外来的意识形态加以解构，意味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部民族基础、历史进程、世界背景和胜利意蕴，将被另一种说辞取而代之。鉴于抗日战争在中国三千年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历史的极端重要性，截断、扭曲、变形、尘封抗战历史，无异于全面走向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和世界虚无主义。而从“反右”到“文革”的“浩劫”以及中国将来可能再需付出的代价，无不是这三种虚无主义的恶果。

作为东方文明古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四强之一的国家，中国错失了从天理、道德、人间法和外交、经济、军事上审判、惩罚和引导日本的机会。无论其中有多少难以应对的尴尬处境，我们也都难辞其咎。无论按现代国际法还是人类天

性，没有受到惩处赔偿的罪犯，不可能真诚弃恶从善。放弃索赔，放弃了对善恶是非的追究，是对战争罪责的机会主义假释。把一次人世间最庄严神圣的审判，消解变形成功利与谋略的诉求，其后果是为自己造就了一个重新强大却没有洗心革面的对手。更可悲可叹的是，无数英烈挣回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大义，由于始终没有充实光大，而涣散于无形。

事情很清楚，改造和防范日本，单有美国的占领和苏俄的掠夺，单有“冷战”、韩战、越战，能使日本再度强大，却无法促进日本在精神和道德上的新生。只有中国可望从人类善良本性、人伦关系（完全可以推及到国家关系）和文明进程上为日本树立矜式，中国高尚的伦理道德智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中国博大的历史精神和天下意识（“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中国的仁爱、厚道、善良、悲悯……，是日本民族从一个半世纪的迷误和堕落中悔过自新的慷慨无私的文明资源。由于时势变异和造化捉弄，更由于中国自身精神和道德的式微与耗散，日本因为历史和地缘本应得到的精神引导和道德教化，始终付之阙如。除了继续“富国强兵”、“脱亚入欧”外，日本别无选择。

中国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直是世界真正的进步力量，中国没有在自己领土之外做任何缺德事，没有对任何邻国构成任何威胁，中国清醒而自尊地没有陷入充斥 20 世纪的种族、阶级和意识形态你死我活的泥淖。中国不仅代表亚洲被殖民，被压迫民族，拒绝日本帝国建立“黄种人罗马帝国”、实现“大亚洲主义”的强力诱惑，而且最早坚定地站在世界自由、民主、文明、光明与和平力量一边。

从 1900 年到 1949 年半个世纪中，中国人饱受列强欺侮，中国也深受西洋先进文明启示，满清帝国的颟顸腐朽和义和团的愚昧仇外，始终不能成为中国性格的主要方面。“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不仅是“华夷之辩”的现代必需，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现代世界之第一步，中国全力以赴地恢复丧失千年的文明元气，同时锲而不舍地求教于西方，中国免于印度的命运，又拒斥了日本的道路，这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孕育的力量和责任所赐。

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最大教训是，囿于历史、地缘、民族性、国家道路抉择的复杂因缘，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在自强不息同时自作主宰。

1949 年 10 月初，中国最有才华最富激情的诗人胡风曾用“时间开始了”几个创世般的词语讴歌新中国的诞生。与陕北老农一样，中国最浪漫最有想象力的作家，除了用“红太阳”来象征新国家新领袖外，已经不屑于任何汉语词汇了。毛泽东被称为中国的卡尔、列宁。

也许是由于必需的历史尺度还不具备，也许这一代国人仍是“庐山中人”，1949 年以后的中国，还是一个曾经和继续引起分歧和争论的巨大话题。

至少直到 1976 年，中国的世界形象决非历史所能认同与怀念。几乎一生都在为中国革命辩护的美国学者费正清，当其晚年看到中国革命的著名功臣张闻天、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惨遭迫害时，痛苦地修改了自己的观点，“今天，当毛站在天安门上面对北京的红色广场时，那些统治了中国几百年的皇帝、天子们，又在他身上证明了中国传统的不朽定律。……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河流中，毛只是其中一粒尘沙——他越斗争，就越深地沉浸于从中国过去承袭下来的规则和迷梦”。他以比他的反对者（从来不对中国报有任何希望的西方汉学者）更为黯澹

的笔触，引用四百年前英王乔治三世外交使节马戛尔尼的日记为自己数十年的学术生命、也为中国前途，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前景："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疯狂的战船。如果说已在过去的 150 年间依旧能够航行，以一种貌似强大的外表威慑邻国，那是因为侥幸出了几位能干的船长。一旦碰到一个无能之辈掌舵，一切将分崩离析，朝不保夕。即使不会马上沉没，也是像残骸一样随流东西，最终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远不可能在旧船体上修复。"

欧洲七个世纪关于中国的描述和希望，都在 1949 年以后成为历史。没有一个西方人会料到，这个礼仪之邦、诗酒之乡，温文尔雅、聪明高雅的民族会坠入一种空前黑暗和恐怖的制度性牢笼，在一代人时间里蜕变为世界上最野蛮、渴血、残忍的巨大人群。经过短短几年观察和极地探险式的实地考察，西方发现，中国已经迅速"进化"成一种比苏俄更好战、更具毁灭性的极权主义帝国。1955 年《纽约时报》载文指出，"中国大陆被一种外来思想征服了，这种思想与中国传统关于幸福生活的观念全然无关，个人忠诚、家庭孝悌，这些传统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已为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不容，包括幽默慷慨、忍耐善良、荣誉和热情"。

西方人惊讶地发现，数亿中国人如同秦始皇时代的兵马俑一样，几乎丧失了最些微的个人特征，清一色的"斯大林－毛泽东式"蓝布衫，军人一般竖起领口，上衣口袋插着一支墨水笔，数以亿计的生灵只有一种思维，操同一种话语，着同一种服装，干同一种活路。1964 年，西方世界最温和的小国瑞士记者斯塔奇获准进入中国，他在《大墙之内的国度》一文中写道，共产党中国已达 6－7 亿人口，土地比美国和英国加起来还大，并且拥有二百七十万常备军，当年爆破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第五支核力量，"这个狂热的、教条的共产党政权，已将

中国变成世界上最富侵略性的国家，世界上武装革命起义的最大温床，成为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公开推行战争政策、并将战争作为实现其意识形态目标的基本手段的国家”。毛泽东公开号召亚非拉即黄、黑、褐色人种联合起来对抗帝修反即白种人，这使当年希特勒式法西斯种族主义大大相形见拙。

索尔兹伯里 1966 年奇迹式地从香港进入中国，他的结论是，古典时代西方人头脑中的“黄祸”已经演变成“红祸”，中共政权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越出亚洲，把西方最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专制主义成功地引入中国，中国对世界的恐怖力量在于，亿万中国人已被驯服，成为没有前例可循的巨大暴力工具。西方人发现，在苏俄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之外，真正的威胁来自东方。红色中国几乎不可阻遏地将成为一个庞大的、人口过剩的、野心勃勃的国家，中共驱使这无与伦比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毛泽东的后备军满怀对西方的仇恨，把革命、造反、起义、战争、流血、恐怖当成天下大义所在，当成悠悠万事中惟此惟大的圣战。他们把美国当成实现其世界革命目标的最大障碍，期望加深美、苏之间的敌意，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分裂，美国与整个第三世界的对抗。

中国以自身数以千万计生命的悲惨死亡，以饥饿、逮捕、公开枪杀、游行批斗和对自杀者的凌辱，让连费正清、赛珍珠、卢斯一类长期同情中国的西方人都感到迷惘、绝望。1966 年 9 月，文革猝然发动，美国《生活》杂志连续三期载文，回顾中国 100 年的血腥动荡，而眼前正在发生的将是更为可怕的恐怖痉挛，这场灾难将把中国和世界带到什么田地，无人知晓。费正清在其《对华回忆录》中悲叹道：“文革暴行将把中国带到我们难以想像的地狱的边缘。”中国已经堕落成世界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极权主义怪兽加暴民恐怖专政的双头恶龙”。《圣经》中所描绘的魔鬼是一种狰狞可怕的怪蛇，1949 年以后的中国，令

人想起一种曾经灭绝了的、侏罗纪时代的、在黑暗中瘫痪甚至窒息了亿万年的怪物。它孕育着某种神秘、凶险、巨大无比的毁灭性力量，它隐藏在那层峦叠峰般的红墙和长城后面，一旦时机成熟，就会让西方和东方自己的文明玉石俱焚。

1960 年代，毛泽东在莫斯科一次全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上嘲笑苏共领导人被核大战"吓破胆"，声称中国人不怕原子战争，中国六亿人口死掉一半，还能埋葬帝国主义。中国确实成为一种让西方颤栗的力量，中国也禀承了一种世界的责任，这两种因素最终没有达到毛泽东念兹在兹的一致，那是中国的万幸，世界的万幸。

历史表明，从 1949 年到 1976 年间，中国奉行"阶级斗争尖锐化"、"全盘集体化"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两个历史时代相比，无论作为世界健康力量还是作为世界正面责任，都出现了严重倒退。在东西方冷战的荒诞对峙中，中国始终是一种严重丧失理性、任性和危险的存在，对于新技术革命和新的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反映迟钝，对自身古老伟大文明更是全盘否定、蹂躏，文革以其空前惨烈、恐怖的过程宣告了中国现代历史灾难性的破产：1949 年以后的中国，其整个制度和意识形态既是对中国历史否定性破坏的产物，也是对西方主流文明激烈拒斥的结果，而其国家精神和治理原则，却主要源自一种异族统治和外来哲学，源自西方文明谱系中一股变异、极端和虚无主义的历史潮流。站在 21 世纪的人们已经看得很清楚，那股曾经出自西欧，经过苏俄，裹挟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半个世界的"历史性"、"世界性"潮流，其实只是西方主流文明的一段不幸的插曲。对于中国，这段外来插曲一度上升为时代的主旋律，这是各种事件、因缘交错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在 20 世纪里遭逢的最大宿命。

历史表明，无论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还是"无产阶级共和国"，"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都是西方文明某一方面、某一阶段、某一国

家或某一阶级的历史目标。高度多元化且变动不居的西方文明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中同时为中国认同和接受，何况，正当“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求取真理时，西方自身却几度陷入危机和黑暗之中。

1900 年，巴黎大博览会拉开了二十世纪的帷幕，欧洲资产阶级全都陶醉在空前的繁荣和希望之中。工业革命、技术创新和社会进步似乎已将文艺复兴和启蒙时代以来的美好预言逐一实现。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从欧洲向世界推广，无数普通人享受着户外活动、阳光、草地、沙滩；火车、轮船、飞机正在和即将把西方商人、外交官、传教士、殖民官员和游客送往世界各地；人口持续增长，社会保障和福利正惠及社会每个角落；司法黑暗已难为公众容忍，酷刑遭到普遍谴责，死刑被争先恐后地废除；无线电和电影即将成为大众消费品，家庭装饰和流行时尚已从巴黎、伦敦走向外省和城镇；自从 1870 年普法战争以来，除了巴尔干地区的小冲突和零星的海外战争外，西方人已经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

然而，乌云和梦魇已开始蔓延。世界变得陌生而荒诞，虚无主义和孤独感在摩天大楼之间徘徊，传统价值观被工业文明和庞大的城市碾碎，各种前所未有的焦虑、苦闷和绝望悄然笼罩。灵心善感的诗人率先发出不祥的声音，波德莱尔、马拉美、王尔德、比亚兹莱、道生、兰波、杰克松、艾略特等人拒绝承认布尔乔亚、银行家、政客和资产者的黄金时代，他们直接用“恶之花”、“荒原”、“地狱”来形容西方世界，将培育了一千年的西方文明和三百年的现代化斥为一堆浸泡着腐尸的恶气浊水。唯美派、高蹈派、恶魔派、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和一切流派，都在诅咒正在上升和扩张的西方文明。接踵而至的是哲学家、历史学家、心理学家，叔本华、尼采、柏格森、斯宾塞、斯宾格勒、弗洛伊德不约而同地敲响了大限将至的恐怖警钟。雅斯贝尔斯满怀忧愁地预言，不但欧洲已经日薄西山，而且地球上一切文化均处于暮霭沉沉之中。海德格尔断定，世界性的精神没落如

此迅速，所有民族都在走向灭亡。松巴尔特指出，我们能肯定预言的，只有人类的毁灭和世界的末日。尼采则以他那句最严厉的谶语“上帝死了”为世界蒙上一道浓黑的词语阴影。历史以两次世界大战，以奥斯威辛、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古拉格群岛坐实了忧患预告者的咒语。

也许是天意，西方文明风雨如晦、日落西山时，苏俄革命也走到自己的尽头。一场受历史启发，以“解放全人类”为旗帜、吸引了无数正直理想人士的全球革命，竟然一夜之间戏剧性地崩溃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废墟中，满目疮痍，血流成河，密布的阴霾充斥着天文数字般的死亡。

西方和半西方苏俄曾经先后升起的精神太阳几乎争先恐后地殒落了，天意如此，中国在走向西方式历史破晓时分的 160 年间，其悲伤、苦情、灾难、死亡又何尝逊于整个西方！

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关于黑暗和黎明、关于力量和责任的历史和生命哲学。

1840 年以来，中国国事蜩螗，“多用瞑眩瘳疾之方，孤注一掷之举，以为最后之一著”。既要安内，又要攘外；既要国族自保，又要实现民权；既要反对西方列强豆剖瓜分，又要抗击同种同文的日本的侵略；既要改变积弱积穷，又要实现平等、正义；既要依靠农民，又要实行工业化；既要进入现代化和全球化，又要向传统寻找根基与合法性……

这一切相互重复、冲突、否定的事变，并非是对西方的机械简单的“刺激－反应”，中国这一庞大的生命－文明共同体正是在近二百年的变异和阵痛中，重新孕育着新的希望。

西方向全球扩张的历史，是一种高度世俗化物质化的过程，其中的善恶、变易、消长可以为中国辩识。中国久远的入世精神和道德诉求最终不难作出适当的制定，予取予夺，不致离谱。

中国古已有之的民本思想和人文情怀，“下一转语”，即不难与西方近代自由、民主、人权、宪政会通，而儒家坚持“人之初，性本善”，则可矫正西方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可能出现的极端与任性；中国道德自我建立的传统，更能防止西方个人原则不可避免地脱序而出的可怕弊端。

西方的天命意识可望自然而然地为中国认同，包括西方历史破晓的历史哲学，所谓“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所谓“天何言哉”，所谓“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中国在坦然面对时代黑暗、坚定走向历史黎明的路途中，有特殊的精神支撑和道德期许，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所谓“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中国纯正的人生哲学是一切历史哲学的基石，在“上帝缺席”的苍凉寂寥天地间，中国人甚至将苦难看成一种天意的垂顾。

中国深通“一阴一阳之谓道”，深谙世道人心微危变易的法则：有“所存者神，所过者化”母体般的文明化育张力。中国曾经作为东方明古国，独步东亚数千载，并且几度“同化”亚洲蛮族。这种神奇的文明化育能力，同样可以在 1840 年以来欧风美雨俄雪席卷全球的大变局中显出端倪。黄仁宇先生以“大历史”的视界坚持带给中国一个“好消息”：中国一百多年来的长期革命并没有失败，单从“1920 年间到 1990 年间只七十年间，中国人集体的把国家和社会向前推进了三百年，这是一种伟大的事迹。……不要忽略我们所处的一个非常时代！”他在《万历十五年》的台北版序和大陆版跋都先后指出：“中国的革命好

像一个长隧道，…此中最紧要之处则是刻下大隧道即将走穿，前面已见曙光。”他不赞成对中国近代史“一片呻吟嗟怨，满纸谩骂”，那样“不外袁世凯错，孙中山错，蒋介石错，毛泽东错，邓小平又错，而蒋经国也错。…如果中国不能适当的找到它的历史地位，决非人类之福”。

中国 160 年来的凶吉祸福，是非恩怨，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尤其是历史关头，在每一个人物身上，几乎都是悲剧性的，中国人领受“天地不仁，以万民为刍狗”这一“天意”，在世界各国中可谓无出其外。但一条潜行的历史法则却每每从无数次的荒诞和悲剧中显现了人类自由本性的主体“善”的不朽光辉。所有的屈辱、冤情、苦楚、流血、灭绝，所有的努力、奋斗、希望、爱和牺牲，都围绕着一条历史的中轴线——走向真正的历史破晓——而被赋予人类精神的自我实现和“人是创造世界的最终目的”这一永恒的意义。

我们度过的最艰难困苦的是历史的虚无时分。对于中国人，取缔了他的历史意识和历史关怀，不啻取缔了他的生命基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先天欠缺天堂与地狱、轮回与涅槃的民族，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历史就是我们生前与死后的世界，历史就是我们自己。对于中国人，开启历史，就是走向未来。越是回溯历史最幽深、最黑暗的通道，越是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无论如何，西方是全球化的先驱，西方的精神太阳曾经光芒万丈，西方对中国的同情并不全是伪善，对中国的诚惧也并不全是讹诈，西方引导的历史破晓时分更不全是一场诓骗。感领过西方精神太阳的辉煌和暗澹的中国，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可望争取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的角色，甚至有可能给危机深重的世

界一种特殊的补益。“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只有把西方文明的主流正脉，西方世界的精髓转化为中国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才可望走向否极泰来、起死回生的觉醒和复兴。

个体生命往往不易理性地理解他所处的时代，更不易知道他这个时代的来路与去向。而中国自 1840 年以来所进入的“非常”历史阶段，实在有太多的教训与经验，挫折与进步。这座历史宝库贮藏了无数仁人志士的心血、精髓、智慧、情感、理想、心愿，这是中国人在近二百年间共同编织的稀世大梦，共同上演的旷世活剧，也是所有中国人的共同家谱，共同遗产，我们走向自己的历史破晓时分不可须臾离弃的烛光、火把、太阳。

中国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一笔拥有广阔土地和天文数字般的人口和财富的世界力量，中国更是一种文明，是造物主注视和眷顾中的生命共同体，是一种世界责任。在听取经济学者、战略家、纵横之士等现代社会的强势声音之余，不妨也回忆诗人、哲学家和文豪们藐似迂阔实则更接近真理的告诫，——至少，他们与前者相比，与现世利益牵涉更少，而与人类本性和文明进程更近，所以他们是真正的时代先知和历史候鸟。

1900 年，列夫?托尔斯泰写下《不许杀人》、《出路何在？》，严斥八国联军在北京烧杀虏掠的暴行，“他们自称是欧洲文明人，是基督徒，不要相信他们，这是一帮寡廉鲜耻、十恶不赦的匪徒！”托氏几度欲致书中国人，根据他对东、西方文明的特异感悟和对人类本性的深刻理解，这位俄罗斯和全世界十九世纪最伟大的道德先知将东方未来寄望于中国：“我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在人类生活中正发生着伟大的转变，在这个转变中，中国应该在领导东方民族中发挥伟大的

作用。”中国欲承担此一伟大使命，必须坚持本民族古典文明的精碎，决不能丧失其主体性地取法西方，只要中国“遵循自己的三大宗教教义，即从一切的人的权力统治下解放出来（儒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道教），实行自我牺牲，温顺，对一切的人和一切的生命都满怀慈爱（佛教），他们现在所遭受的一切灾难便会自行消亡，任何力量都不能战胜他们”。

托尔斯泰虽然没有到过他神往的东方，没有见过一个中国人（见过几个日本人），但他已从日本身上预感到某种不祥的征兆，“求上帝别让中国走上日本的道路吧！中国人民，也像所有的人们一样，应该发展自己的精神力量，而不是一味地完善技术。如果精神力量被扭曲了，技术的完善只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如果中国“把在欧美已被明眼人识破、完全站不住脚的形式照搬到中国来，那就是致命的大错了”。

对于义和团展示的中国 20 世纪激进主义的早期趋势，托氏深以为忧，“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不要推动忍耐，不要改变对暴力的态度”，他反复告诫中国，“不以恶报恶和不参与恶，不但是得救，而且也是战胜恶的最为妥善的方式。如果中国人民真的失去了忍性，那么这就可怕了”，他引用赫尔岑的话说，未来世界，“不可能有一个拥有电报和电动机的成吉思汗”。

托氏预见到，他的祖国与东方和中国有某种命运上的联系，“有着一种内在的、心灵上的联系，他们应该手挽手走在一起”。但是，这位不仅是十九世纪，也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的预告者再次告诫说，俄国和中国这两个伟大民族之间，“千万不要以种种外交联盟的形式中政府结盟的形式”，因为任何结盟，都是丧失自信和别有他图的结果。

1949 年底，毛泽东到莫斯科为斯大林 70 寿辰祝寿，后者曾说了一句“大实话”，“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听谁的呢，同属俄国民族，一位是民族灵魂的代言人，不仅终身致力于反对沙皇专制、农奴制和愚昧、黑暗，而且洞察人心，对人性的原罪、邪恶和暴力本能有足够清醒的警觉。一位是凌驾于国家和民族之上的暴君。历史已表明，斯大林主义给中国输送的，既不符合中国历史文明之道，也悖于世界主流文明之途，同时也为俄罗斯历史所难容。

中国 20 世纪的伟大朋友之一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孙中山、宋庆龄、蔡元培、梁启超都曾诚挚地邀请和欢迎这位东方首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来华，胡适、陈独秀、辜鸿铭、林语堂、瞿秋白、鲁迅等人都对泰戈尔主义发表过由衷的评论，周恩来 1956 年访印时还强调：“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1924 年春，泰戈尔在北京、上海、南京、济南、杭州、太原等地巡回演讲。中国国民党刚刚召开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在苏俄撮合下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接受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华民国”这个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开始出现了经由苏俄导入的西方激进主义思潮。泰氏告诉中国东道主，东方确实“必须接受西方的真理，即使仰慕和赞美，也不为过”，如果拒绝西方，“我们的文明就会流于片面、呆滞、了无生气”。但是，泰氏与托尔斯泰一样，希望中国不要盲目取法西方。

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又最苦痛的时代，各个民族都会先后从他们的“隐秘居所”走到人类这一共同世界中来，泰氏不无忧郁地说，“人类的真正胜利还没有实现。今天，半人半兽的子孙们在世界各个角落兴起，其恐怖形式，比那些史前巨兽更富毁灭性。人类正在逐渐地失去自由、人性和生活，强权和文明披着面纱以掩盖其食人的习性，堕落和灾难已经开始征服世界，人类跪拜在金

钱和权力的偶像前”。作为刚刚经历了寻求“进步”的民族中的一员，泰氏忧心忡忡地告诫中国：

我不能相信地球上任何民族同时可以伟大而又是物质主义的，我有我的信条，也许你们愿意称为迷信，我认为凡是伟大的民族都不会完全受物质主义支配。种种自然的现像都涵有妙不可言的消息，使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内蕴的欢快，我不相信你们的灵魂是天生的聋窒。

我们东方人从不敬仰与死亡打交道的将军，也不敬仰巧舌如簧的外交家，我们只敬重精神领袖，他们能拯救我们，否则，我们将要灭亡。物质力量最终不是最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会摧毁它自身。机枪和战斗机能使无数生灵丧失其下，而西方也会沉入其中，我们不准备步西方的后尘，去比较谁更自私，谁更残忍。⑥

泰氏从英国对于印度两个世纪的殖民历史中看到，“冲突和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义的根源和核心。人类历史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有道德的人、完善的人，在几乎是不自觉的情况下，越来越屈从于为这个政治的商业的人——只有有限目的的人，让出地位。这个过程借助于科学的惊人进步，正十分得势，引起人的道德上的混乱，使人性方面在没有灵魂的组织的阴影下，变得模糊不清。我们感到它像铁钳似的紧紧钳着我们的生命根柢”。

泰氏是对民族主义这一“使全世界为之颤栗的魔鬼般的恐怖”最早发出预警的东方人，他在《西方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发明

的一种最强烈的麻醉剂。在这种麻醉剂的作用下，整个民族可以实行一整套最恶毒的利己主义计划，而一点也意识不到他们在道义上的堕落——实际上，如果有人指出，他们会感到非常恼怒。”

在访问中国之前，泰氏在访问日本时，曾以日本和亚洲人民“忠实朋友”身份，直言叩问日本：

全世界在等着观看这个伟大的东方民族从现代手中接受机会和责任以后准备做什么。如果是单纯照抄西方，那么它唤起的巨大希望将会落空。因为西方文明向全世界提出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并未找到圆满的答案。个人和国家之间、劳资之间，以及男女之间的冲突；物质利益的贪欲和人的精神生活之间、民族的有组织的自私自利和人类的崇高理想之间的冲突；同商业和国家的庞大组织不可分的一切丑恶的错综复杂的事物与人类要求单纯、美观和完全消闲的天性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都需要用一种还没有想象得到的方式使之达于和谐。⑦

他像告诫日本一样告诫中国，一个国家突然惊讶于巨大的成就，从历史角度看，这是非常危险的。考验将是严峻的，傲慢的沙暴会湮没智慧的路径，傲慢导致盲目，造成隔阂，埋下毁灭的种子。泰氏的眼光似乎穿透历史，看到今日中国的某些侧面，“污损的工程已经在你们的国度里占据了地位，污损的精神已经闯入你们的心灵，得到你们的钦慕。假使你们竟然接受了这个闯入的怪物，假使你们竟然得意了，假使因此在几十年间你们竟然泯灭了佻们伟大的天赋，那时候剩下来的还有什么？……因此我竭我的至诚，恳求你们不要走错路，不要迷惑，

不要忘记你们的天职，千万不要受那恶俗力量的引诱，诞妄的巨兽的叫唤”。

与托翁一样，泰氏也对中国寄寓着深深的东方式希望：

你们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你们的智慧是坚信善，而非仗恃力量。

人类的文明正等候着一个伟大的圆满，等着它的灵魂的纯美的表现，这是你们的责任，中国应该在这个方向中尽你们的贡献，凡是有圆满品性的都属于人类，我远道而来，圆满，这就是我感领到的中国款待远客的恩典。⑧

日本辜负了这位印度诗人和整个东方的希望，日本受到了可以被视作“天谴”式的惩罚。作为亚洲第一个完成工业化和物质现代化的国家，日本的榜样不仅是灾难性，而且是悲剧性的。直到今天，日本在道德和精神上仍然无力自拔，作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仍然保持着文明侏儒的可悲形象。

日本的教训绝非大和民族的单独遗产，日本明治以后奉行的狂热民族主义、富国强兵国策和军国主义，都在文革前后的中国社会闪现过其不祥的色泽，日本民族最惨痛的教训，莫过于傲慢与狂妄，一个崇尚物质与武力的民族，一个昧于文明、不谙和平、不尊重人道的民族，一旦因缘凑齐，就必然走上战争和毁灭之途，中国人不应忘记我们的学生、仇敌和罪人犯下的弥天大错。

作为 20 世纪亚洲世界最著名的代言人之一，作为最先和完全被西方征服的伟大古代东方文明的捍卫者，泰戈尔曾对西方文明深致敬意，他用印度独有的

融宗教、哲学、诗和音乐为一体的文体，讴歌西方文明“太阳般”的辉煌灿烂。有史以来，还没有一位西方诗人对本西方民族表达过如此充满人类高尚情感的情感，也没有一位西方哲人怀抱着如此悲天悯人的圣哲之心：

我必须毫不犹豫地承认欧洲的伟大之处，因为它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我们情不自禁地衷心爱它，对它表示最崇高的敬意。这个欧洲，在它的文艺艺术中像瀑布似的源源不断地倾泻着美和真理，滋养着一切国家和一切时代；这个欧洲，有一种力量无穷的巨人意志，正在跨越宇宙的高山和深谷，从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取得它对知识的尊重，运用它全部的伟大智力和心灵恢复病者的健康，解救人类的苦难，那些苦难直到现在我们都是无可奈何地在忍受着；这个欧洲，正在使大地出产比它似乎可能出产的更多的果实，诱导或强迫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为人类服务。这种真正的伟大必须在精神力量方面拥有它的动力。因为只有人类精神能够蔑视一切限制，相信它的最后成功，将它的探照灯照向黑暗的远方。在欧洲的心中，洋溢着最纯洁的人类之爱、正义之爱和为崇高理想作出自我牺牲的精神。多少世纪的基督教文化，渗进了它的生命的内核。在欧洲，我们看到高贵的人，他们维护人权而不分肤色和信仰；他们在为人类事业奋斗的过程中勇敢地面对来自种族的诽谤和侮辱，并且大声疾呼，反对疯狂的穷兵黩武，反对无情报复的狂热或者有时将整个民族攫为己有的掠夺；他们随时准备补救自己民族过去所犯错误，自豪地设法阻挡卑劣的潮流，这种浪潮横流无阻，因为受害者的抵抗软弱无力。现代欧洲担负着这种豪迈的使命，他们对自由的无私之爱，对不承认地理界线或民族私利的理想，都没有丧失信心。这些就证明持久的生命源泉在欧洲并没有流尽，此后，它会不断地获得新生。欧洲在慈善方面是至高无上的，在这

方面它面向全人类；但是欧洲在邪恶方面也是至高无上的，在这方面它只面对自己的利益，用它全部的巨大力量，以反对人类中无限的东西和永恒的东西。⑨

中国也许是西方思潮在东方和全世界的最大实验场，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在中国打下其鲜明的烙印，欧洲工业革命和现代科技革命正在推动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愿托尔斯泰和泰戈尔的智慧、西方的成就和悲剧，都化为中国的精神导引。

与一个封闭、停滞、专制、落后、死气沉沉的中国形象同时传布于世的，是一个神奇、高尚、美好、和谐的中国形象，这一形象甚至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一则遥远的启示。

四百年前，利玛窦就盛赞中国正是西方柏拉图以来倾慕不已的哲人王乌托邦："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区别的重大事象是，（中国）全国都由知识阶层，即通常称做哲人的人来治理，他们井然有序地掌管着这个国家，在事关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时，这些哲人一旦听到召唤，其品格崇高与不惮危险和视死如归，甚至超过将军和士兵。"这位欧洲早期传教士尤其对孔子给予最高的评价，在西方哲学家的命运是悲惨的，苏格拉底死于非命，柏拉图被西西里国王卖为奴隶，而在基督诞生 500 年前，孔子即以其高妙玄奥又朴实通俗的道德哲学来激励他的人民追求一种充满灵性、艺术感和高尚情怀的人生，孔子的智慧和道德生活远远比世界各国所有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为神圣，孔子开创的儒家道德哲学是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不朽准则，人民用以修身，君王们用以治国。

法国重农学派领袖魁奈曾发表《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批驳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有关中国的论断，认为“中国统治者的专制主主义和绝对权力被我们的政治作家们大大地夸大了”。而启蒙运动的领头人物们没有看到“一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一直存在至今的国家”，是严重的失察和有失公道。其实伏尔泰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评价，是不会令中国人反感的，他称中国人的宗教和道德简洁、明了、庄严，不迷信，不野蛮，孔子既无兴趣扮成一个有灵感人的，也没有以预言家自命，他只推崇德行，不宣扬神秘主义，中国文化要比西方文化早得多，成熟得多，文明得多，中国在科学、医学方面落后于西方，但中国不迷信，讲求容忍、明智、宽和，尤其中国人厌恶狂热，出自本能地拒绝绝对主义和极端行为，最值得西方效仿。

西方耶酥会士曾经抨击中国哲学的无神论倾向，谴责中国人的偶像崇拜本性，德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创始人莱布尼兹为此专门撰文为中国辩护，他嘲笑“我们这些后来者，刚刚脱离野蛮状态就想谴责一种古老的学说，真是狂妄之极！”，这位以发明微积分著称于世、最富现代学意识的欧洲智者在《论中国哲学》中写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有一个极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

罗素的睿智用于中国时，一点不逊色于他在《西方哲学史》里对西方思想的分析，他坚信，从全人类的立场看，无论中国历史曾经充斥着何等深重的专制苦难，中国文化的腐朽和过时多么令人痛心，但是，中国可能造成的灾难，“远远要比在欧美占统治地位的傲慢自大在全世界所造成的灾难小得多”。中国人发现并已经实践了许多世纪的生活方式，如果它能够被全世界所接受，则将使全世

界得到幸福，“而我们欧洲人却一味要求奋斗、掠夺、无休止的变革，不及贪得无厌。如果我们不能够学到一些东方智慧——正由于那种智慧，我们才藐视它，那么导向破坏的效率只能以毁灭而告终，我们的文明正走向这一结局”。

无论把中国看成世上天国般的乌托邦人间乐园，还是定为东方绝对专制主义的渊薮，无论“中国崩溃论”，还是“中国威胁论”，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企图，都是中国的真实写照，都是中国自我认识的辩正因缘。应该承认，自古希腊哲学和基督教弥赛亚救赎精神问世以来，西方精神总的气质是客观、理性的，其心理倾向和文体风格是科学、实证和公平的。而中国性格最可诅咒的品性便是虚饰、病态自尊（出自专制主义训育出来的自卑和奴性）、对真实和真理的冷漠、怯懦，道德上的虚无主义。中国两千多年的帝王专制统治，中国更为古老的农耕文明传统，中国“焚书坑儒”的可怖可耻行迹，中国历久不衰的人文主义潮流和君子之风，中国反复遭受亚洲腹地蛮族入侵和统治，孔子及其后学筚路褴褛的求道精神，都是这片时空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历史共同体，西方智者提供的正是一幅完整的中国历史谱系，是中国求之不得，受之加惠的民族生命诊断书，是命运对中国的大恩典、大惠顾。

1966 年，中国正陷于文革浩劫中，罗素在为《中国问题》重印本所作序言中称，他 1922 年访问中国得出的观点没有任何改变，他坚持认为，中国天然是一个世界问题，就因为其人口占人类四分之一这一点，也是如此。“全世界都将受到中国事务进展的极大影响，无论好坏，在今后两个世纪内，中国状况的发展将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罗素从世界历史进程指出：“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种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孔子以来，埃及，巴比伦，波斯，马其顿，包括罗马帝国，都消亡了。但是中国以持续的进化生存下来了。它受到了外国的影响——最先是佛教，现在是西方的科学。但是佛教没有把中国人变成印度人，西方科学也不会将中国人变成欧洲人。”按孔子的思想和办法，任何外来文化，夷狄蛮族也好，西洋文明也好，都能按照儒家“化成天下”的原则而“中国之”。但是，危险和陷阱一直在中国面前，罗素坚信，“假如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吸收我们文明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排斥那些他们觉得不好的东西，那么他们将能够在其自身传统中获得一种有机发展，并产生将我们的优点同他们自己的优点结合起来的辉煌成就”。罗素告诫说，但中国的伟大前途只有在避免了两种相反的危险后才有可能实现，第一种危险是，中国被“完全西化”，迄今为止他们所具有的民族特性被全部磨灭，世界只不过多了一个“不知疲倦的、精明的、工业化的、军事化的国家，这些国家正在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应该稍加引伸的是，从“打倒孔家店”到“走俄国人的路”、“以俄为师”，到文革“与传统彻底决裂”，中国事实上曾经一度走上被西化（“俄化”）的歧途，其启示录般的景象可谓“殷鉴不远”。第二种危险是，抵抗外来侵略的时候，中国“也许会被逼到一条除军备以外，在各方面都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道路上去。这已经在日本发生了，在中国也很容易发生。如果中国不进入军国主义的行列，他们可以创造出一种真正新型的文明，这种文明比我们在西方所能创造的任何一种都好”。

文明的生存和湮灭，一直是我们星球上的历史－精神奇观，一种伟大文明，其“优秀的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如果沦落为“强悍的统治者多数人”，该

文明就不可挽回地走向衰亡。文明的死寂、国家的陨灭、民族的堕落，永远是自杀，而不是他杀或几个他者的合力谋杀，——对于中国文明，尤其如此，汤因比大概是最能够从历史使命高度为中国文明作出正面预言的西方历史大家，中国人从中看到的，是完全不带种族和文化偏见的西方经典精神：

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可能是中国。实际上，中国 2200 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是影响半个世纪的中心。

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共同自杀之路，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中国人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上文化上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日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⑩

汤因比马上补充道，“不论怎样，中国也是用强大武力完成统一的”。今后世界的统一方向，“不是像中国那样采取中央集权的作法”，而是采取各国以平等的立场和资格进行协商这种“联合的方式”。从这种意义上说，与其说中国是中心，不如说那里有某种启示作用，而“欧洲共同体的尝试，大概能真正成为全世界的楷模”。

中国在经济和物质甚至军事力量上持续强大，中国在精神、道德和思想上的持续低迷，大概是二十一世纪最令人触目的世界性事变。正是在中国力量持续

对世界事务施加影响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世界责任也势所必然地成为全球性事变。所有真正关切中国命运和使命的男女都必须作出抉择，所有这些抉择将共同推动中国走向未来。一位才去世几年的中国哲人兼智者，在其八十高龄，超越二十世纪的大限，顿悟出中国在 21 世纪的特殊使命：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立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厮杀，但是中国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真能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每一代人都必须、也只能面对自己身逢的时代，每一个时代都充满着独特而亟待了却的夙愿和危机，绝大部分经验都源自与时代潮流直接遭遇的历程，无论厚古薄今还是现代自大狂，无论虚无主义还是寻神论，都不能拒斥时代的诱惑侵蚀，都力图戳破时代的玄机。柏拉图身边雅典神庙廊柱间的微风与孔子眼前的沂河逝水并不只有形态的差异，它们唤起的是迥然不同的人生感受。尽管古希腊哲学家家憧憬的是尚未来到而势所必至的理想之国，中国圣人怀念的是早已消殒的大道，而他们念兹在兹以至生死与之的，仍然是己身所属的时代。我们都是时代之子，时代是每个人终身的襁褓。日月星辰的升降运行，春夏秋冬的周而复始，都会在某一个瞬间触发我们与生俱来最纯粹的惊叹、赞美、敬畏和感戴之情，惟有时代的清流浊水能把我们带到彼岸或遗弃在荒野孤岛，时代是我们的宿命。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在两代人时间里经历了世所罕见的政治迷狂和经济发展，积累了如此之多的精神创伤和物质膨胀，引起了如此之多的侧目、惊愕、嫌恶、歆羡、怖悸、效颦、置疑、逢迎、遏制；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一

样，臣服于梦魇般的现代偶像崇拜后，如此疾速地转向道德虚无主义和拜金主义，数以亿计的生命对财富、感官、享乐和一切世俗“成功”的欲求被刺激到人类社会不曾出现过的程度、规模；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各种冲突、矛盾、隔膜、危机，文明、野蛮，古旧、现代，贫困、富裕，落后、发达，专制、民主，封闭、自由，群盲、精英……，几乎在一切领域都充斥着无数悖论；没有哪个时代像今天一样，不仅决定着一代人的安危祸福，而且承载着无数代人的期许托付，影响着未来若干代人的生存和意义，没有哪一代人像我们这一代人一样，面临着中国和世界都不曾面临的情势。

我们正处于一个前所未有时代，它最为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经过五个多世纪的接触，冲突、交流、融合，东西方正在突破奠基于两千多年前轴心时代的文明范式，走向一个建基于经济、贸易、科技发展之上的物质全球化时代，并且势所必然地走向一个价值、艺术、文化、理想，融汇了所有民族特性的精神全球化时代。

享廷顿等西方智者已率先对冷战终结后的世界作出了分析和预判，其中关于世界前途的冷静而深刻的分析，以及悲观而阴郁的预言，包含着西方基督教以来两千年间特有的末世悲情，其对人类建立共同价值的可能性所持的深刻置疑，虽则体现出西方不朽的理性精神，却未必是对人类前景的真实写照，更不应不受讨论地成为笼罩世界的主流思想。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古代思想的高明庄严，正在被世界历史证实。从世界历史视野看，我们正处于人类共同文明的初始阶段，曾经从列国并争、诸子蜂起的春秋战国时代升华、结晶，被秦火焚烧、被异族统

治却一直潜存于中国精神生命之中的东方智慧，也正从“花果飘零”的绝境走上“返本开新”的新路。2006 年 12 月 5 日，华裔美国史学家余英时先生荣膺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奇人文社科终身成就奖，他以《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为题的答奖词中指出：

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我们分明看到，站在当今世界最高文化荣誉奖台背后的，还有从孔子到唐君毅，从庄子到胡适的全部中国精神先贤，中国不仅是一种世界物质力量，中国更是一种世界精神力量，中国不仅赋有自我拯救的天然责任，中国更有与人类共同获救的神圣责任。

2010 年 2 月 11 日 重庆

（此文是《帝国与共和：中国命运的两种抉择——李慎之先生逝世六周年祭》一文的上篇。中篇待續）

注释：

①赫尔德：《关于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中国》（Ideen zur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der Menschheit）第三部，里加和莱比锡，约翰·弗里德里希·哈尔特克诺赫出版社，1787 版。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所在的东方》，三联书店，1956 版。

③歌德：《抒情诗·西东合集·致祖莱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

④葛立格：《孙逸仙先生——世界公民》，《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一册。

⑤孙中山：《国父全集·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议》，1973 年台北版。

⑥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与学生的谈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

⑦泰戈尔：《民族主义·日本的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⑧泰戈尔：《在中国的谈话·与教师的谈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年版。

⑨泰戈尔：《民族主义·西方的民族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 年版。

⑩汤因比：《中国印象·中国与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

—— 原载:《纵览中国》

帝国与共和：中国命运的两种抉择——李慎之先生逝世七周年祭（中）

王康

中国再次徘徊于历史路口。

两种截然不同的抉择和命运同时并存于中国。

有几种力量和观念正在塑造时下中国，并把中国推向一个新的大帝国之路。无论就其幅圆、人口、经济、财富（尤其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军事还是制度、行政规模和官僚体系，乃至历史情结、遭遇、记忆和现时在世界图景中的特殊位置，中国都已具备有史以来最大帝国的诸项要件。

将上述因素拼合为帝国形态、尚未成形为能够公开陈述与表征的只缺两个要素：新帝国缔造者和新民族主义。

因为下述两种原因，新帝国缔造者不可能在可以想象的将来出现。一是毛泽东对党内同事的整肃比斯大林对“列宁近卫军”的清洗更为彻底，导致独裁统治的历史性断代；二是邓小平的世俗性现代转型，从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上堵塞了独裁统治在短期内卷土重来的路径。

新帝国缔造者在血统和世系上的阙如，却很可能导向斯大林→毛泽东式亚细亚帝

国在精神上的复活。其现代承继的天意和法理基础，将是某种地缘历史和民族共同体空前恶性综合的帝国诱惑。

就历史沿革而言，新帝国已经具备三种巨大资源：春秋、秦汉五百年间的“天下主义”，辛亥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振兴中华，统一中国”的大汉族主义，以及“英特纳雄耐尔”到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的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观。“天下主义”使中国版图维持了两千多年中央大一统集权主义的一统世界，任何导致中国分裂的力量和可能性，都不可能对抗这种“在政治和文化上把几亿中国人团结起来这一无与伦比”的人类最大非理想观念。占人口 94%的汉民族成为维系这种主义难以撼动的血缘基础。

孙中山所缔造的亚洲最早最大的民族共和国，既包含近代大变局全部“亡国灭种”的忧患教训，又接纳了美国革命到法国革命再到俄国革命的法律制度遗产，并声称继承了中华帝国从尧舜文武周公以降的正统地位。经过北伐东征和抗战以及二战结束全球非殖民化运动，又撞上美苏冷战而滑入世界共产主义新天下主义。

邓小平改革开放一个不期而遇的世界性境遇，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柏林墙坍塌带来的全球化时代。中国成为新技术革命，高科技浪潮和资金、技术、贸易、人口全球无障碍流动所产生的空前历史红利的最大享有者。这一结果，意外地强化了中国的帝国实力与意欲。

由于邓及其继位者执意拒绝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革，斯大林－毛泽东遗产反常地存活并成功融入了经济发展进程。国家垄断型现代化在苏联、东欧停滞、失败后，却在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西方、尤其美国智囊人物在后冷战时代，过早宣告了意识形态的终结。福山、亨廷顿等人关于文明冲突的诊断预见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却不能解释后苏联时代从叶利钦到普京俄罗斯帝国的死灰复燃，更未能辨识中国在经济上崛起带来的真实的世界意义。

在中国一切变化中，最剧烈最重要而又最少得到研究和分析的，是中国国民性和民族主义。

五·四前后，以日本为发端的“华族国民性”、“支那观”和l“中国印象”整体服从于日本帝国的“大亚洲主义”和“黄种人罗马帝国”史观，服从于日本侵略、奴化并灭亡中国的帝国目标。它源自 1868 年启动的明治维新，历经 1874 攻台，1895 甲午得手（“日清战争”）、1905 对马一役战胜沙俄、1910 吞并朝鲜数次变法、战争，并强力引入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欧现代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优越论，法西斯体制，军国主义以及俄国、德国现代绝对主义和极权国家概念），它必以压制中华民族主义，尤其否定辛亥革命至北伐东徵时期由国民党主导的中国现代国家合法性为前提。

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虚无派早期受制日本“支那观”，以通盘否定中国历史、传

统、文化和种族性为宗旨。《狂人日记》、《阿 Q 正传》纯然是北一辉、内正、内藤湖南等日本支那史学者“华族国民性”的文学翻版。中国国民性呈现空前否定性形态：贫穷、愚昧、自私、冷漠、滑稽。既不见东方悠久传统踪影，又无任何现代西方文明影响。乃是比土耳其、波斯、印度等亚洲民族更无独立、自治、转入现代社会可能性的“铁屋”状态。鲁迅后期则深受苏俄斯大林主义影响，公然指控中国现代民主政府及其执政党，自甘卡尔、伊里奇和约瑟夫的信奉者，甚至陷入对托洛茨基派的围剿与迫害。而由日俄两国在中国的代理势力的特别塑造，以及取代“五·四”启蒙运动的苏俄式红色新启蒙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鲁迅先后被抬举为“民族魂”和“中国的高尔基”，毛泽东再将鲁迅定为中国新文化的方向，现代中国一等圣人。

1949 年到 1976 年近三十年间，鲁迅反复鼓吹“痛打落水狗”、“费厄泼赖缓行”，诬蔑中华文明为四千年‘吃人筵席’及其对知识分子的厌恶、蔑视，对中国底层的膜拜等，成为历次政治洗清和以对中国历史文化空前摧毁的天条式经典；更与输自苏俄斯大林主义的“全盘集体化”、“阶级斗争尖锐化”、“无产阶级专政”、领袖绝对崇拜和暴民拜物教结合，造成新型国民性。在“狂人”、“阿 Q”诸般恶习之外，平添残忍、狂妄、嗜血、拔扈、滥施暴力。

邓小平“一切向（前）钱看”、“发展是硬道理”，尤其“六·四”镇压的总恶果，再次改造了中国国民性。在毛之后，中国社会公然鼓吹寡廉鲜耻，贪婪无度，犬儒哲学，道德虚无、反智主义和整体堕落腐败的恶俗现代化。

这是人类历史上未曾出现过的民族主义。毛泽东集秦始皇、斯大林之大成，仇视文明、善良、宽容、慈悲和一切人性人伦人权人道；邓小平则拒斥一切高尚、理想、神圣，以物欲、利益和现世功利再次徵服中国。在两者之间，则一以贯之以唯物主义、无论神和历史虚无主义。

一个痛失其伟大传统，历经蒙元、明清专制毒化，又遭日本侵略、苏俄精神徵服的民族，一个积累了巨量苦难、仇恨、狂热、偏执的国家，一个数以亿计缺乏敬畏、感恩、救赎，不认同自由、民主、宪政的饱受精神创伤而又充满世俗欲望的人类最大共同体，一旦被某种事变刺激，被某种意识形态裹挟，被某个领袖蛊惑，那就谁也难以逆料它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显示其力量、意志和愿望。

欧洲，美国，俄罗斯乃至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都无以作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参照。

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是对自威斯特伐利亚以后欧洲民族主义的历史性超越。传统绝对国家主权和民族至上论因为两次世界大和冷战而消褪于历史帷幕后面。欧洲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人民诸项传统主权范围的竞争与扩张，已经被一种新型超国家共同体逾越。但它那具有人类文明新型范式的伟大尝试，对中国却几乎没有吸引力。

美国作为人类文明天然熔炉，更与中国呈现几乎全然相反的形态。只要中国庞大

社会维持目前状态，中美之间的根本差异将几乎难以避免地演变成冲突。

俄罗斯仍处于自彼得大帝以来的历史低谷，大俄罗斯主义退缩到四百年来不可能再狭小的空间。中俄之间出现某种结盟以对抗西方，并非天方夜谈。

苏俄文豪和圣哲索尔仁尼琴曾在致苏共领袖公开信中告诫：建立大帝国的愿望与道德高尚的民族是不相容的，追求帝国的民族注定要遭殃。二十世纪，德国法西斯“第三帝国”、大日本军国主义帝国和苏联红色共产帝国三大帝国的覆灭已证实了索氏的预言和论断。

中国现代民族性是中国内外历史事件、思潮和运动交相影响的产物。现在仍处于深刻变化的阶段。中国民族主义无论出现何种面貌，都必然强烈改变中国并影响世界。

如何抵御大帝国的诱惑，避免帝国噩梦变为现实，是中国民族、尤其思想界最严峻最重大的历史性责任。最早对帝国前景发出警示的是李慎之先生。不妨将我们这位先知的有关思虑略加引申。

中国令世界瞩目的经济增长与同样令世界瞩目的专制主义制度，两者在中国同时并存的状态已临近终点。究竟是中国现代经济增长最终“消解”中国的专制主义，内承中国历史传统的“精华”，外与西方主流文明正面遇合，从而造福中国与世界，还是中国专制主义利用中国经济增长成功复辟中国历史传统的“糟粕”，为祸中国与世界，其最危险、最需警觉的，是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转向新的大帝国道路的可能。

先生虽然很少直接使用“帝国”一词，但已预感到它的不祥之兆：“一样是威武雄壮的阅兵，一样是欢呼万岁的群众，……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这种壮观场面的国家应该是不多了，也许只有金正日领导下的朝鲜才有这样的劲头，但是它国小民穷。”而“中国是天然的大国”，“作为数量上占人类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时间长达两千年的一种模式，……最好就称之为帝国主义”。

中国向来缺少西式民族主义，而有东方式的天下主义。先生指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两大目标“反满”、“反帝”已经通过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完全实现了，“不料，到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的民族主义却有了一个新的转向。由在世界的东方四征不庭、万国来朝的天朝上国情结发展出一个‘世界革命的情结’。……中国历史上是东亚的大帝国，几千年一直是世界第一大国，形成了中国人一有点条件就不甘屈居人下的心理，我称之为虚骄之气。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往往叫人害怕。”（李慎之：《和平奋斗兴中国》）

我所担心的是：中国的极左路线，其最高目标，同时也是其最后动力就是“搞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这是中国人民“即使没有裤子穿”，也一定要“进行到底”的。就是这股“虚骄之气”几致中国于死地。二十年过去，中国人口袋里的钱稍稍比过去多了一点，但这股虚骄之气又在爱国主义的名义下本着国家主义的实质开始冒起来。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这是一种历史的大感觉和大提防，这是植根于巨大的历史异数和剧烈的文明创痛的忧患和预感。中国专制主义如果重新复活，它的最后阶段和最高形式就是大帝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纯属虚幻的景象，却是曾经笼罩了中国二十年之久的历史浩劫，是先生晚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从“中央之国”转到“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的中心”再转到“大中华红色帝国”，并不只是某一个或某一些人的梦呓。

中国天文数字般庞大的人口、幅员辽阔的疆域，近代以来它的受难、屈辱、创伤、不幸，它的孤愤、积怨、忌恨、危机，它与西方主流文明失之交臂而远未消弭的隔阂、疑惧、对峙和冲突，它那沉潜不显却欲伺机再度引发的底层革命和共产圣战，以及秦汉帝国、罗马帝国和东西方所有大帝国的历史诱惑，都可能在某种历史环境下，一齐转化为一个“高耸而立”的大帝国的历史资源。一言以蔽之，中国步武凯撒、亚历山大、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汉高祖、元世祖、明太祖、清世祖、毛泽东之后尘，走上一条扩张、征服、革命、战争之路，并不缺少它的缘由、动力和基础。

君不见，无论“极左”还是“极右”、“社会主义者”还是“资本主义者”、“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国家主义者”还是“民族主义者”，都会在高唱“大中华”时热血沸腾，都会为“巨龙腾飞”的远景热泪盈眶；

君不见，中国国家主流传媒决不与西方在自由、民主、人权、信仰领域，更不在国家制度、法律精神以及全球价值、全球伦理、全球安全和全球秩序上展开严肃的对话；

君不见，中国一些狂热分子的激进主张（《中国可以说不》、《超限战》、《为中国声辩》等）几度走红，广有市场；一位曾经以传播自由为己任的学者近日迫不及待地站到民族主义阵营一边，推出《中国站起来》，不存避讳地为义和团以来的仇外势力声辩。中国青年一代在“9·11”事件时的“自由”而“独立”的狂欢表

演已一再令世界瞠目结舌；中国国家电视台通过直播，通过中国的“天之骄子”——北大、清华男女学生——对美、英国家元首的挑衅性（当然是经过安排的）质问所表露的骄狂、轻蔑和敌意，乃是向数亿中国青少年暗示和引导对自由、民主、人权的否定和拒斥。

君不见，无论海湾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无论伊拉克战争还是巴以冲突，中国都从来不站在西方一边，官方军事评论权威甚至按捺不住地在电视上教诲萨达姆卫队和伊拉克人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去淹死、烧死美英联军，而对美、英联军的任何伤亡、失误不加掩饰的幸灾乐祸……

君不见，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全球气候环境、全球核不扩散和全球反恐战争等攸关人类存亡福祸的重大领域，正形成并亮出自己另起炉灶的世界性战略，这种战略已使人类临近又一轮对抗和毁灭的威胁。

一言以蔽之，中国拒绝与西方握手，拒绝与西方对视。——除了满清王朝式的颟顸虚骄外，中国统治当局还另有一套价值系统和意识形态，另有一套世界观和世界战略。

如果以李慎之先生为代表的知识界仿效八十年前鼓吹“纯正社会主义”、“超大国时代”、“大亚细亚主义”、发起日本“民间法西斯”运动的北一辉、大川周明、井上日召、权藤成卿等日本“有志之士”，仿效七十年前公开集会支持希特勒和“德国国家社会主主义”运动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海森堡、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经济学大师沙赫特、艺术史家平德尔等纳粹知识名流；如果以先生为祭酒的中国知识精英公开宣扬“国家第一”、“民族至上”、“中国高于一切”、“二十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如果以先生为矜式的中国学人公开拒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公开对抗现代化、西方化、全球化，公开颂扬绝对专制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狂热爱国主义、奴性集体主义、工具英雄主义，那么，中国离帝国之途，也就一步之遥了。

任何诱发和强化帝国意欲的言论举措，都将是对中国最危险最有害最凶险的误导，都将使中国近代以来全部经验和教训付之东流，都将使中国文明（包括近二十年的物质成就）毁于一旦，都将把中国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都是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极其反动、极其无耻的挑战，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的启示录式的威胁。

当这种东方、亚细亚和中国式的专制主义还没有溢出它的边界、还没有尝试它的世界形式时，先生与无数国人已经从内部饱受过它的残酷刻毒了（中国红卫兵一代和“群众专政”犯下的罪孽难道不比希特勒德国的党卫队、冲锋队和斯大林暴政的“契卡”和“克格勃”多吗！）。皈依专制，拥戴独裁，效命帝国，意味着对中国和人类一切正面价值和理想的蔑视和背叛，对现代文明的反动和对人类本性的进攻，也是对一己生命不可宽赦的犯罪。

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历史、文明、道德和人生的大限。

也是一条对国家、民族真正负责、忠诚和挚爱的大限。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先生为中坚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界，与权力当局和弥漫全中国的物质崇拜、权力崇拜、国家崇拜、专制崇拜的“集体无意识”之间最后的分野，就在这条大限。先生晚年全部圣贤之心和先知之智，就是首先守住这条大限，守住中国文化的主流正脉，守住中国的生机与希望。

让我们再次回到苏俄（整个二十世纪，苏俄对中国的影响最大最深，中国至今没有正视），借几名先知之笔对这个曾让东、西方同时发抖的大帝国最后的崩溃投去浮表的一瞥。

最早预见到苏联帝国崩溃的，是一名西方剧作家。

1949 年，东、西方冷战铁幕垂下，苏联已牢牢控制着东欧，斯大林几乎成为人类“救星”时，瑞士德语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发表了四幕历史喜剧《罗

慕路斯大帝》。这位自阿里斯托芬、易卜生、萧伯纳和布莱希特以来最出色的西方戏剧大师，借西罗马帝国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这一历史戏剧主人公，天才地预示了四十年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这名苏联末代总书记的出现。他们的共同使命是，利用其特殊身份，运用“老良知”和“新思维”，让历史上最强大也最不义的帝国寿终正寝。

当女儿和女婿愿为罗马牺牲，妻子谴责他背叛了帝国缔造者，帝国元帅、财政部长和骑兵队长都发誓与日尔曼人血战到底，宫廷侍从深信“罗马这样伟大的帝国根本就不会完全崩溃”时，那位唯一领悟到历史真谛的先知说道：

几百年以来，我们已经为国家作出了那么多牺牲，现在，该是国家为我们作出牺牲的时候了。

罗马早已死亡了，你们在为一个死人作出牺牲，为一个幽灵而战斗，为一堆倾圮的坟墓而生存！

几百年以来，大罗马帝国之所以还存在着，就因为它有一个皇帝。因此对我来说除了自己当皇帝，以便有条件消灭帝国以外，别无它法。

不，爱祖国不应该超过爱一个人。对一个人忠诚比对国家忠诚要伟大得多，也困难得多。

我们的爱没有使罗马变得善良。如果祖国变成杀人犯的巢穴和刽子手的屠场，就把它弃如敝履吧，你对它的爱已经苍白无力。

背叛了我的帝国的不是我。罗马是自己背叛了自己。它曾懂得真理，却选择了暴力；它曾懂得人性，却选择了暴政。罗马历代皇帝的宝座由层层头盖骨堆砌，建基在无数牺牲者骸骨之上，它的债务还没有偿还，罪孽还没有清算。一夜工夫时代已经破晓，牺牲者的咒语已经应验。

我一生都算计着罗马帝国崩溃的那一天。我授予自己充当罗马法官的权利。我牺牲罗马，通过牺牲我自己。

无所畏惧地观察世界，无所畏惧地做那些正确的事情，学会战胜恐惧，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必须掌握的唯一本领。

1969 年，正当苏俄帝国处于其鼎盛时期（刚刚严厉镇压了“布拉格之春”，准备对中国发动核外科手术，“一劳永逸”地削弱中国，解除中国的威胁），犹太裔历史学家阿马利里克就在《苏联能生存到 1984 年吗》一文中预言：“这个由日耳曼人、拜占庭人和蒙古人所建立的东斯拉夫大帝国已进入了自由生存的最后数十年。接受基督教曾经延缓了罗马帝国的覆灭，但未能使其免于必然的灭亡；同样，马克思主义学说推迟了俄罗斯帝国——第三罗马的崩溃，但无力阻止它的崩溃。”

1994 年，索氏结束二十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国。苏俄解体，分崩离析，“俄罗斯再度陷入可怕的状况”，索氏的告诫一语成谶。索氏再次对祖国发出呼吁：“俄国只有从帝国的偏见中解放出来，俄罗斯灵魂才能复活。”

应当指出，在没有大规模暴力流血的条件下，世界上最强大的极权主义帝国几乎自行解体，乃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对于解除冷战和热核战争的毁灭性威胁，对于自由、民主、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对于世界的缓和与发展，以及对于中国的现代发展和现代复兴都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而对于俄罗斯人民，却是在经过了 74 年的漫长苦难、付出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生命代价后，才看到了那个专制帝国寿终正寝的一天。

“俄国总统普京是第一个向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表示慰问和支持的人。几个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俄国人几乎可以说是全心全意地转向西方，向美军开放了历来被视为俄国的后院与禁脔的中亚以至高加索地区，完全改变了古老的地缘政治

学认为自己已被包围、受威胁的观点，而代之以所谓“地缘经济学”的观点，以为这将促进这片落后地区的现代化而有利于俄国及其前“属国”的经济发展。改变如此之大，而普京的民意支持率还居高不下，一直保持在七成上下，这是值得世界上任何政治家羡慕的。有俄国评论家说，普京的事业是三百年前彼得大帝全盘西化的战略经过严重挫折与倒退以后的恢复与延续。追溯俄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只有融入全球文明的主流才是俄国最大的民族利益，这也应该是全世界一切民族的必由之路。由于历史的原因，俄国虽然已转向民主，但还不是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民主所必须要求的法制还远未确立，目前的转变是它挣脱奴役十年以后的又一次突进，对世界的明天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它不但是世界上地域最广大的国家，还是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且千万不可忘记它还有半个世纪称霸半个世界使全世界在它的威胁下战栗的历史，迄今手里还握有威力可与美国比拟的核武器。‘9·11’以后，英国首相布莱尔曾表示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阴影中应当能诞生永久的善良’，我也抱有同样的希望。”（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中国不能重复苏俄的老路，中国并非没有重蹈苏俄覆辙的可能，中国如果走上苏俄帝国的老路，它的前途和结局将不堪设想。

先生已经站到中国和世界历史交汇的时空高处，他的不可推却的历史使命，是拦截和阻断中国专制主义（尤其是“社会主义”牌号的专制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的合流，尤其要警惕这种合流泛滥成“绝对”和“极端”的大帝国祸洪；同时，推助中国自由主义与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主流价值融汇，再为中国文化在全球化世界潮流中的庄严复兴，为东西方文明的伟大遇合，开出新路。

这就是先生圣贤视域中的中国救赎之道，先生全球视域中的中国复兴之道，这就是先生寄身和仙逝的世界潮流、天地境界。

先生中年而后四十年间，长期面对一个大困惑：中国专制主义为何会在二十世纪下半叶“借尸还魂，变本加厉”，全面复辟且至今犹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怎样才能最终消灭专制主义？

在生命最后几年，先生单枪匹马对中国专制主义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一次严正的审判。

先生绕过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约翰·穆勒、里查德·琼斯到马克思、列宁、魏特夫等西方人关于“亚洲古代村社和治水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和“东方

专制主义”诸理论大厦，撇开中国官方学术界仰人鼻息奉为圭臬的“五阶段论”的历史笑柄，“截断众流”，独自闯进中国二十世纪的昏暗堂奥，擒住了中国现代专制主义这头“东方利维坦怪兽”的“总角”。

先生“避开一切可能的争论”，首先直接将批判锋芒指向中国专制主义“老祖宗”秦始皇，将公元前 221 年秦嬴政自称“始皇帝”“立定”为中国专制主义的“元年”，指认王夫之“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李卓吾称秦始皇为“千古一帝”、谭嗣同“两千年之政皆为秦政”以及毛泽东“百代多行秦政制”之谓，“实在千真万确”。“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这个大帝国，确立中国专制皇权的人。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中国实行的就是皇权专制主义，我杜撰了一个英文名词，叫做 emperorism。二千年间虽有损益，但是基本上没有变化，在中国一直由皇帝统治。”（李慎之：《新世纪 老任务》）

先生明言，秦始皇“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棰拊以鞭策天下，威震四方”，一统天下所建立的乃是中国第一个“大成至上”的专制帝国，是“中国停滞论”真正的历史起点。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灾难性的断裂、变异和倒退。它“车同轨，书同文字”，“六合同风，九州共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它结束了天下共主、列国并立的封建制度，“历览前史，中国的封建时代恰恰是人性之花开得最盛最美的时代，是中国人的个性最为高扬的时代。只要打开《左传》和《战国策》一看，就会发现那个真正的封建时代有那么多铁铮铮的汉子以

至妇女。你甚至会纳闷，中国人后来是不是堕落了？……我所最推崇的中国人恰好就是中国封建时代的人，那么尊严，那么‘强哉矫。”（李慎之：《“封建”二字不可滥用》）结束了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秦帝国开启和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绝对皇权专制”、“普遍奴隶制”“军事官僚专权”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专制帝国传统，将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毒根，深深植入中国的头颅和心脏，它是比地理条件、自然环境严酷千百倍、中国两千余年间所有苦难和罪孽的总根源，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古老、最黑暗、最阴森、最封闭的专制帝国，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之集大成。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起亚洲第一共和国；“五·四”运动引进了“民主”与“科学”；抗战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并跻身世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四强之列；共产党以“人民解放”、“当家作主”、“反专制、反独裁”、“争自由、争民主”相号召，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秦始皇所建立的一套制度已经不折不扣地是落后而且反动了，而他的伟烈丰功却还是压在中国人民的心头，而始终不敢改弦更张，……而以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面专政’达到高峰”，而毛泽东竟公然标榜自己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直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中国最当红、其父辈没有少在 1949 年后、尤其文化大革命中尝够专制滋味的电影导演，竟也为秦始皇招魂，将“英雄”的桂冠套在这位专制暴君一世的木乃伊头上。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这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谱系，截然相反的哲学，泾渭分明的历史潮流和民族命脉。为什么“整个二十世纪，在大量中国传

统文化扫地以尽的时候，其中最黑暗、最反动的专制主义却历世长存，而且变本加厉，最后竟发展为最野蛮的群众专政……！中国人的爱国主义竟退化为依附于专制主义而极端粗鄙狂妄的民族主义！”为什么秦始皇取代孔夫子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正脉”？毛泽东取代孙中山成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流正脉”？专制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现代中国的“主流正脉”？

先生拨开历史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层层思想迷雾，“以其历经世变沧桑后的大彻大悟，以其非凡的智慧和勇气”（傅国涌语）洞穿了中国专制主义的斯芬克斯真面目。

首先，通过军事战争夺取政权，建立起“经济、文化、国民性都由之决定”的“政治制度”，即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的中央集权大一统国家；其次，创立一套旨在维系、阐释、强化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体系”。

先生深刻指出，自秦一统天下以来，中国文化传统的“主脉正流”已转向为“一种政治的文化、权力的文化”，一言以蔽之，专制主义的文化，“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文化”，几乎受到中国古代所有学派和思想的“支持”，甚至具有神学和形而上的终级意义。中国专制主义政治制度与其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共荣共损，缺一不可，且共存于“一个所谓‘上下五千年，纵横九万里，人口数万万’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大躯体之中”，这个“庞大的‘垂而不死、腐而不朽’的身躯”不仅无情而有效地统驭和禁锢着中国人的肉身和内心，而且“还有足够的力量包容、消解、篡改、转化”一切外来的现代化因素。

就实际历史说，则秦始皇与作为其对立面的陈胜、吴广以及两者的结合正是中国“激进主义或曰极左路线”的活水源头。这种思潮以劫富济贫、分田废债的平均主义为一端，以“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专制主义为另一端，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中一直没有断绝过，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其结穴的杰作而已。而且，由于其社会基础迄今仍然存在，我们现在还不能放松警惕。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单靠西方理论（无论古典还是现代、马克思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社会，尤其不可能解读中国古代精神，因为几乎不存在地缘、空间、事实和经验的联系和交流；而欲观察近现代中国，则必须具备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历史文化贯通解读的眼界和器识，先生正是以其丰富的中国经历，以其对中国与世界二十世纪交互历程的宏大而犀利的眼光，对中国专制主义从秦始皇到毛泽东的历

史环境、资源、动力和路向，完成了前所未有的综合性思考。

先生强调，“‘五·四’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启蒙运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一个半世纪以来，‘五·四’先贤的觉悟为最深最广最高。……‘五·四’的精神就是以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以理性的精神来打破几千年来禁锢着中国人思想的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它与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是人的解放的开始，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开始。”（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中国启蒙文粹〉序》）

但历史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提供西方文艺复兴、启蒙时代那样壮观而持续的时空舞台。相反，历史以其诸多“意外事件”、以其诡秘不宣的“偶然性”几度搅乱了以“五·四”运动为起点的中国现代启蒙运动的步伐。

由西方发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纵容的“二十一条”、半西方人的俄国人发动的十月革命、俄国人声称的《加拉罕宣言》、《越飞－孙文宣言》以及日本人发动的侵华战争……这些本来与中国无关、至少不由中国负责、更不由中国掌控的外部世界事件，完全不容中国极少数启蒙主义者对中国的现代认识和现代设计，而大幅偏离、最终背弃“五·四”启蒙运动，出现二十世纪第一次严重断裂和错位，乃是中国难以避免的历史宿命。

先生以过来人和觉悟者的特殊感受指出，从 1919 到 1949，开头是“救亡压倒启蒙”，接着是“革命压倒民主”，最终是“专制压倒革命”。真正使“五·四”

运动发生变形、转向的，比外部世界所有重大事件更有压倒性力量的是“源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一个世界性大思潮”，即源于“从俄国革命引入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源于“要求达到社会运动根本解决的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史观”一类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崭新的历史理论和世界观；源于“在全世界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解放全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高理想”。

这就是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艾思奇、李达、邓初民、张友渔、张申府、何干之、沈志远、钱亦石、潘梓年、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以及陈豹隐、王亚南、郭大力等成百上千名中共党员和左翼知识人为骨干（这个“理论队伍”在文化大革命中改换成同样以毛泽东为首，以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为骨干的“写作班子”），根据“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奉斯大林旨意编写、被毛泽东称为‘共产主义百科全书’”、实则充斥着谎言和谬误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编写的《大众哲学》、《社会学大纲》、《新政治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等作为普及读物‘启蒙’了一代共产党人和左翼精英的‘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由于二十年代末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苏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提前完成、苏俄抗击德国法西斯的特殊贡献、二战后斯大林主义对东欧的胜利以及东西方冷战的降临等一系列国际事变，最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 年的胜利”，“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而且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

“我们这些青年左派，青年共产党人，因为受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影响，相信在民主的价值之上还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价值，那才是我们值得为之斗争并且为之献身的全球价值。这种思潮在整个二十世纪都影响广大，一度发展到三分天下有其一。”（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自此，一种全新的世界性意识形态君临中国，一种全新的国家制度按照这种意识形态建立起来，一种全新的以“世界革命”、“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为终极目标的国家“赶超”发展战略，得以确立，一种按照这一国家战略制定的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外交制度得以建立。这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和全新的意识形态现在成了唯一的、绝对的、决定论和永恒性的真理，成了“不落的太阳”。在它的笼罩下，中国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和核工业；一切资源、力量、情感和意志都必须服从这个总目标，一切不同意见和个人自由都必须严加控制；最后，最重要、“悠悠万事、惟此惟大”的是，必须要有一名集最高权力和最高真理于一身的最高权威。

于是，中国人终于听到了这样一种声音：“秦始皇比孔夫子伟大得多。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中国有古典诗词修养的人士终于读到这样一首律诗：

劝君少骂秦始皇，

焚坑事件要商量。

祖龙虽死业犹在，

孔学名高实粃糠。

百代多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从子厚返文王。

于是，中国人终于从“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极度概括、极端坦率的表白里，领悟到了什么是“以最最最革命的形式来实现中国历史上、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暴最烈、最黑暗、最野蛮的专制主义”；终于经历了秦始皇以来，中国第二次历史性的中断、变形和倒退：“世界上最最最革命的理论与最最最专制的传统相结合，使中国形成了最最最黑暗的毛泽东思想三十年的统治。中国传统的专制变成了极权主义。”（许良英：《痛悼挚友、同志李慎之》）

“从毛到邓，他们这一代讲的专政，同三权分立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个意识形态的形成很自然，但是有这个意识形态，我们的苦头就够大了。毛嘛，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实际上是秦始皇加斯大林，从中国继承了秦始皇，从国外继承了斯大林。”（李锐语）

于是，中国人终于看清了一个历史怪兽的真面目：如果说秦始皇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集大成者；毛泽东则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与半西方俄国专制主义杂交的集大成者；终于明白，只有这种现代专制主义集大成者才具有将中华文化几乎摧毁殆尽，将中华民族几乎推到绝境那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毁灭性力量。

于是，中国人也终于等来了历史开始复归正道的启机：中国现代集大成的专制主义已经因为文化大革命“天怒人怨”、“人神共愤”的结局遭到“全盘否定”而丧失了在中国的公开“支持”；又因为苏俄、东欧的和平“易帜”而丧失了来自世界的公开“支持”，专制主义终于临近“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末日了。

感谢历史的发展到二十世纪最后结束的时候，中国舞台上各种可能有的思想总算已经亮相得差不多了。今后要进行战斗，……我的看法是，当面的敌人就是一个，就是在中国绵延了两千两百年的专制主义，虽然自八十年代起它已因自身的腐烂而日趋软化，但极权的本性未变。要救治专制主义，只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以至个人主义，别的出路是没有的。几百年的世界近代史，一百年的较量应该可以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是现代化过程中的支流或者逆流。自由主义则是主流，而且是全人类迟早都要走的必由之路。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承认，他是经历了五十年的痛苦磨练和艰难思索，才正式与中国新老专制主义集大成者决裂，势不两立。

先生仍然忧心忡忡，“五·四”民主启蒙被“新启蒙”取代，而无论“旧启蒙”

还是“新启蒙”，都一概成为了专制主义的牺牲或奴仆。

“‘五·四’运动总司令、第一个把‘德先生’和‘赛先生’请进中国的陈独秀，当他经过二十年的磨练阅历而重新觉悟的时候，已是‘刑余之身’，贫病衰老，僻处江津小城。……他的话连死水微澜也已引不起来了”；一贯倡导民主、鼓吹自由的“胡适和他带出来的一批留洋生，在号称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人中不过是零头的零头”；“对中国的专制主义与奴隶主义的揭露和鞭挞其力度无可比拟的鲁迅，晚年政治思想急剧左转，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而中国“新启蒙”的左派们（先生再三表白自己曾是其中一员）在领到“黄金世界的预约券”、进入由“新启蒙”催生的“新中国”后，所受的磨难和意外，更远胜于“旧启蒙”的先贤。

真正的、唯一的胜利者，仍然是“几乎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专制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主义与蒙昧主义的遗毒仍然根深蒂固，由此而来的极端主义的心态，深深地埋在中国人民的心底，随时可以复苏而反扑过来，一个世纪以来都有反复表现，真是所谓‘心中贼难除’”。“中国人确实如胡风所说，是浑身带着精神奴役创伤的人，要冲决中国几千年专制主义传统的罗网是何等困难”。“专制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生活方式，要一个十几亿人口的社会整个地换一种‘活法’，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也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有世界意义的大事。”

“中国的传统文化自从秦始皇称帝一统天下的两千二百年以来，一言以蔽之，就

是专制主义。救治专制主义的唯一出路，就是启蒙，就是以近三百年来作为人类历史主流正脉的自由主义取代专制主义。”（李慎之：《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专制主义的毒素不仅远未从中国的社会机体内排除干净，而且在特定环境下，还可能引导和促使民族主义的“恶魔”成分突然转化为毁灭性的非理性力量。

欧洲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对阳光下的份额”、“权力意志”和“生存空间”的觉醒和渴望，极大地增进了财富和文明积累，同时催生了欧洲十九世纪两股最强大的思潮：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它们一旦与被伤害被刺激、精力充沛而规模庞大的民族生命和民族运动相汇合，就会焕发空前强大的盲目力量，这种力量一旦与某种邪恶有毒的使命意识相碰撞，就会产生二十世纪希特勒德国和斯大林俄国式的恐怖帝国。

曾把欧洲和世界以及德国自身拖进深渊的“第三帝国”，其精神内核就是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后者在十余年时间里迅速演变成“人民群众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演变成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原始力量，演变成“人民性——民族性——兽性”的法西斯历程。

先生曾再三总结他所属一代中国人的铭心刻骨的迷误和觉醒，以作中国年轻一代和全体国民的倾覆之鉴。“当时在我们这些左派青年的心目中，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就像我们那时候爱唱的《祖国进行曲》里所说的那样，‘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但是不过十五年，苏联当政者（斯大林）的罪行披露，苏联原来是专制程度绝不亚于希特勒德国，而远过于我们心目中专横独裁的蒋介石中国的国家。”（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在审视中国外交的演变历史时指出，“毛泽东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斯大林那样的人物。斯大林最高的头衔是‘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这正是毛泽东追求的目标。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开号召‘解放全人类’。中国的红卫兵也把这个口号喊得震天响。……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全面的，它在国家制度方面更是岿然不动。目前，意识形态的因素只是比毛泽东时代大为削弱，从根本说则不但继续存在，而且又转化成为某种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中国正当的民族利益形成扭曲。……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他们捡起列宁、毛泽东关于帝国方义存在就有战争的理论，主张对美国说‘不’，质疑邓小平‘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说，并且批评中国政府的外交太软弱，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尤其因为中国是一个天然大国，面积还略大于美国，人口世界第一，历史世界最长，五十多年来宣传起来的民族自大心理又深入人心，改革开放后经济有了好转，因此又出现了一股盲目狂妄的虚骄之气。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在中国，尤其在不明事理的青年学生中，似乎很有市场。如果任其发展，可能危及民族前途。”

2009 年 10 月 1 日，天安城楼上站列“新中国”新一代领袖人物，并举行中国和人类有史以来最大阅兵式。全世界都在观察着这个时刻，都在等待着接受这个庞然大物的自我定位和抉择。

另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力量，另一种前途也神意地存在于中国。关于中国高尚使命，慎之先生的运思亦可作当下和未来若干年间的珍贵参考。

先生常说，他是以长远的乐观来掩盖眼前的悲观，但先生从来没有因为眼前的悲观而放弃当下的责任。

先生最早最坚定向国人呼吁：回到“五·四”，“重新点燃启蒙的火炬”。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呼吁中国修改宪法。他希望中国参考美国制订的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的经验，“早早修订出一部也能管一百年、二百年而无须作重大修正的宪法，这正是中国人民的利益所在”。

先生最早最坚定地“鼓吹议会民主和多党制”，主张尽快进行政治改革。他告诫说，“如果不及时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可能“像飞机在空中失控一样，造成惨

剧”。

先生个人念念不忘、身体力行的，是在中国、首先是青少年中间，推行公民教育。

中国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成为一个一个独立的、自由的、能主动追求自己的幸福、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文明的公民。

从不随地吐痰、不乱抛果皮纸屑到坐公交车要礼让老弱妇孺，都是公民课最起码的内容，一直到懂得什么是政党制度、文官制度，懂得什么是对权力的制约平衡，什么是司法独立，懂得什么是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宪政国家，懂得以法律保护自己的权利和权益。

为什么中国的现代化一百年来成就不大，以致被称为“九死一生的中国现代化？”第一个原因就在于中国始终没有能培养出够格的现代化公民。没有能培养出不但能自尊而且能自律、不但能自强而且能自胜的独立自由的个人，没有能培

养出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的独立自由的个人。

公民教育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四个现代化以外的更重要的“人的现代化”。它不但为四个现代化提供前提，也是为四个现代化设立目标。

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近年以来，我又萌生了一个愿望，很想编一套 12 册（备 6 年 12 个学期用）的中学公民课本。它应该分两个层次：头 6 册是供初中用的，也就是每个上九年义务教育的人的必读课本；后 6 册是供高中用的，也就是有条件上高中的人的必读课本。因此它应该有循环加深的特点。我虽然有此志愿，只是学无根底而年已老迈，自知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倘若有志于此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愿意担当起这个神圣的任务，我还愿意以衰朽残病之躯追随左右，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与有荣焉。这实在是我可以设想的 21 世纪对祖国、对人民的最好的礼物！

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李慎之：《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

这就是先生的坐言起行，先生的“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先生置庞大的国家机器和各种意识形态禁锢于不顾，兀自召开会议，作出规划、分工。除了何家栋先生几位清贫志士“协助做一点添砖运瓦的工作”外，整个社会完全无动于衷。这一切，都丝毫无损先生践行这一宏大而朴实的“志愿”的古道热肠。无数后来者是否会从一个八旬老翁的夙愿中再次倾听到中国古代圣贤的不朽誓约：“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当中国终于建立起自己的现代公民社会时，亿万男女公民也许早已记不起曾有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为他们的公民尊严、权利、责任、义务而流尽最后一滴心血。先生当不会为此悲哀。

无论西方哲人抑或东方圣贤，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以传播真理、绵延文明。苏格拉底不惜生命代价而为“青年的导师”，托尔斯泰以誉满全球的声誉却不惜花费精力为孩子们编写“初级课本”；中国自“万世师表”孔夫子以来更有两千五百多年“师道”传统，近代仁人志士无不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和“新民”的精神致力于国家的新生和民族的复兴。

中国和世界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运动卓越奠基人晏阳初于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人类四大自由原则外，提出“人民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为占人类四分之一的

中国人“睁开眼睛，识字读书，扩大心胸，培养知识力、生产力、强壮体力、组织力，为中国新民”奋斗了八十年，而千古传颂；

梁漱溟、卢作孚、张伯苓、罗家伦、陶行知、黄炎培、梅贻琦、谢循初、吴铸人等先生都曾为中国现代教育呕心沥血，卓然成家。据称，就连没有接受过现代完整教育的毛泽东，晚年也厌倦于“领袖”、“统帅”、“舵手”一类缺少雅望的称号，只希望保留“导师”一项，称其晚年的愿望是回湖南老家做一名普通教员。

先生“做一辈子的中学公民课教员”的心愿，最与陈独秀晚年编写《小学识字教本》略同。陈独秀晚年患高血压，不顾“左边耳聋、右边脑子时时作痛”，将生命最后三年全部用于“下一代儿童能循此学习，当省却许多脑力”的识字教本上。“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陈独秀只好独自辛苦，当写至下篇《合体字》“抛”字时，还未作解释，便成绝笔，连《小学识字教本》上篇的油印校对稿也没有看到，这名中国共产党缔造者、“五·四”运动总司令、新文化运动旗手便在江津郊野穷乡僻壤一户简陋的瓦房里抛弃尘寰，撒手西归。

先生早年幸逢一名优秀的小学公民课教员，青年时代自己做了深受欢迎的中学公民课教师，从中年到晚年，先生更深感“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因而衰年发心，致力中国公民教育。“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时时都在为唤起人们的公民意识而努力。可惜，慎之先生走了，中国失去了一个最优秀的公民老师！”

大概是 1999 年 8 月，慎之从美国归来，立即找李郁询问公民教育进展情况，并且给我写了封信：“问了一次李郁，才知道先生已着手开始公民教材的准备工作，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如果有一天能够成立‘公民教育研究会’，那就是可以千秋万代的工作，我们这一生就可算有一个目标，也有一个归宿了。（对我们这些七十以上的人言，也只能如此。）”虽然很低调，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社会上思想混乱，如果我们能编出一本公民教程来，对政府与人民，中央与地方，立法与行政，行政与司法，立法与司法的关系……都有顺应世界潮流合乎文明原则的表述，我倒真想看看有什么样的英雄好汉敢来挑战。

直到去年年终，慎之还在约任不寐参加编写《公民课本》，可见慎之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没有停止努力。恩格斯说：“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这不过一次小小的挫折，我们永远也不会接受失败。我相信慎之设计的《公民课本》或《公民试行教程》是一定能编成的。

——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始终保持谨慎而坚定的信念，这种信念得到民族命运和时代精神以及历史事变的“支持”，更得到世界潮流和中国历史大势的“支持”。

先生最后的信念和支持，则是源于他与现代专制主义长期对峙、从生命意识最深处喷涌而出的现代中国集大成的圣贤世界的支持。

当代中国，孤独、悲观如先生者，可谓寥若辰星；通达、乐观如先生者，也可谓寥若辰星。先生正是在中国的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最宽广的谱系之间，展示着一个圣贤生命的光彩。

先生对中国和世界前途持长远的乐观，因为：

“真理在我们一边”，

人性在我们一边，

历史的辩证法在我们一边；

天命、上帝在我们一边。

先生对中国最终寄于乐观希望，是因为他已看到了中国的希望，那就是复兴自由主义，走向全球化。

先生衷心推崇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布拉格之春”代表人物之一哈维尔，推崇他在“后极权社会”中呼吁人们凭良心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推崇他那看似离奇实则真实可靠的“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推崇他那神秘的信仰：“希望、惊奇、博爱、对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它存在于任何事物的背后，又居于任何事物之上，对此，人们应当永远谦卑。”

先生是 1949 年以后最早反思和警觉斯大林主义的中国人之一（他曾为此向毛泽东提出实行“大民主”，建立宪法法院，“还政于民”，并主编过中国唯一一本《批判斯大林问题文集》）。他隆重推介哈维尔，因为这名捷克剧作家不仅也是从斯大林绞肉机里“滚”出来而继续追求真理的思想斗士，而且是东欧“天鹅绒革命”一面胜利的旗帜，是以自由、民主、人权、宪政战胜了斯大林主义的一个划时代的典范，对中国有着非同寻常的启示意义。更重要的是，先生从哈维尔身上发现了铲除专制主义的最寻常而最有效的武器，即从每一个人内心一点一滴地剔除专制主义的存在基础，用人皆有之的“良心”和“真话”的权利消解、挑战以至最终终结专制主义。这与甘地“不合作”、“不以暴力抗恶”一样，都是直指本心、诉诸人性的大智慧。

历史没有以苏俄（它的巨变太艰难太复杂）、而是以一个东欧小国的自由之光来显示其本性和希望，但在先生焦渴而敏锐的眼中，它已经足以让中国欣喜、振奋、向往了。

先生几乎逐字逐句引用的哈维尔的貌似简单的话，想必也可作为他所希望的现代精神在中国最终胜利的借鉴：

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

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

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这股力量并不直接参与权力斗争，而是对人的存在这个难于揣测的领域发生影响（难以预料的是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下，和多大程度上这种影响得以产生）。一场突然爆发的社会动乱，表面上铁板一块的政权内部的剧烈冲突或者社会和文化界气候发生无法压制的转变。因为所有的问题的关键被谎言厚厚的外壳掩盖着，我们无

法弄清楚什么时间那最后一刻会来，那最后的打击会来。

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人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良心的声音，甚至所有抽象推论的声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图超越于良心的呼声之上的责任。

必须回到政治的原点——有个性的个人，必须唤醒个人的良知。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民主机构，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会的价值所支持，也将不能在自身之内保证其合法性。没有共同拥有的和普遍树立起来的道德价值和责任，也就没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场经济也不能恰当地运转。

这些都还不是症结所在。当前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生活在道德沦丧的环境中，我们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应心对我们来说已习以为常。我们已学会不相信任何东西，不再关心别人而只顾自己……（我这样说时）我针对的是我们所有的人，因为我们全都已经习惯了、适应了这个极权制度，接受了这个制度是不可改变的事实，从而成全了它的运行。换言之，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但是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它将来也不会得胜。只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没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纵历史的人才会安于得胜的观念。人间天堂还没有得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的时刻，得胜的只是一个真正

的希望。

先生诸多愿望之一，是为中国人编撰一本苏俄、东欧二十世纪史。先生是《第三帝国的兴亡》这本深刻影响一代中国人的历史巨著的主要策划人和主要译者之一，对二十世纪为祸世界的极权主义有极深刻的研究。斯大林主义对中国的灾难性影响，先生更有切肤之痛。完全可以设想，由先生主其事编撰的与“第三帝国”孪生的“第三罗马”的兴亡史，一定会使中国从极权主义浓黑的阴霾中再次惊觉。“哈维尔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极权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运作情况。在那个时期，生活的逻辑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例子多到不胜枚举，布哈林、季诺维也夫、还有哈维尔本国的斯兰斯基都是。哈维尔应该认识到，从那个时代转变到人们多少可以争取‘说真话’，‘从小处着手’，桥下流过的水（不，是血）已经很多了。”既然历史已经走到后期极权主义社会，那么也就可以套用中国人十分熟悉的雪莱的诗句：“冬天已经到来，春天还会远吗？”（李慎之：《无权者的权力和反政治的政治——后极权主义时代的人生哲学》）

自由不仅出自人类本性，而且出自宇宙本性。自由是天地间最基本最普遍最无须强制和阐述的精神，人性和文明一天也离不开自由。近代以来，人类所有伟大的历史运动，莫不高举自由的火炬。对自由有独特理解的马克思，也把自由与共产主义相联系，甚至在骨子里从不理解自由为何物、视自由如寇雠的造反派头目毛泽东在掌权以前，也没有少以自由相标榜。

使将来的历史学家难以理喻的是，自由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大陆一度成为洪水猛兽式的异端，成为国民生活的最大禁忌，甚至成为修辞学上的一大避讳。

西方经过希特勒和斯大林两大反自由帝国的兴亡，自由主义已经长成参天大树，并成为现代西方自我约束、矫正的天然武器。中国虽然不必从头开支构建自己的自由主义价值体系，却必须践行自由主义的道路。

先生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开山祖师，也未必能称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理论权威，而是 1949 年、1989 年以后自由主义在中国两度中断之后起死回生的“破题人”、自由主义实践的领头者、自由主义目标的预告家。

先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抱有罕见的乐观，他的理由未必赅备、深刻，却以其特有的“宏大叙事”风格，为中国自由主义展示了历史－逻辑的趋势：

我们已经有了一百年的传统。……中国儒家和道家这样的主流文化中也可以找到与自由主义相容、以至相互促成的资源。

我们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必然发展经济的自由主义，而经济的自由主义正是其他各种自由主义的基础。

我们现在正处在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市场化已成为全球性的潮流，自由和自由主义也越来越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价值。

世界经过工业化以来二三百年的比较和选择，中国尤其经过了一百多年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社会试验，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证明，自由主义是最好的、最具普遍性的价值，……自由主义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到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的发轫和复兴》

公元耶酥 1840 年或孔子 2391 年或略称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第一次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向，中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的中国，中国的命运第一次与世界结为一体。对于中国，这是开天辟地未有的大变局；对于世界，这是划时代的大事件。

无论有多少迷误、悖谬、悲剧以及惊觉、抗争、成就，占人类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其安身立命、其现代复兴，都只能在与世界潮流的际会和融汇中，才可能求取。

无论中国如何惊涛骇浪、经纬万端，都可以概而括之，“回过头去看，许多先行者提出的方案，不论是维新还是救亡，不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也不论是搞世界革命还是与国际接轨，统统都为的是走上全人类都要走的必由之路——全球化之路。”（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对中国最重大的贡献，是把全球化的潮流、趋势、方向引进中国，以中国古代伟大德慧把中国引向全球化。先生是二十世纪末中国最终摆脱厄运、晦气和异变，走向世界、走向现代、走向全球化的历史性触媒，是苏联解体、东欧易帜、中国现代转型风雨如晦之际，为中国另辟路径、为中国历史贞下起元式的现代悖兴而英勇前驱的精神摩西。

王康

2010 年 2 月 11 日 重庆

（未完待續）

—— 原载: 《纵览中国》

帝国与共和：中国命运的两种抉择——李慎之先生逝世六周年祭（下）

王康

1991 年，“六?四”血痕还淤积在中国人心底，尚未结痂，专制主义“类人孩”（余世存语）还在自由世界上演权力争斗和阴谋政治令人恶心的丑剧，国内思想界正以“识时务为俊杰”、“现实即合理”的东西“哲训”自行瓦解、自弃理想，随波逐浪，中国重归于无声。

“慎之的特殊意义就在于，在‘万马齐喑’、‘万念俱灰’的九十年代初，在知识阶层的思想再次发生动摇的时候，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将自由民主确立为全球价值。……在九十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何家栋：《未了的心愿——怀念慎之》）

先生思考、研究、引介和推动全球化，其胸襟之博大、眼界之开阔、气象之宏伟，当今世界，无出其右。

先生起始便不是从书斋式学术的角度，也不以某种“历史理念”或“绝对精神”的名义，甚至不仅仅是从中国的命运出发，而是从宇宙的起源、地球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本性”、“人类的宿命”以及人类文明与世界全球化的历程，以一己生命的体证和整个民族三千年的智慧、一百多年的挫折和经验，面对全球化。正是通过对全球化“彻里彻外，彻头彻尾”的反复运思，先生终于为中国觅见到从危途转向正道的历史契机。

先生在回首中国二十世纪的苍黄风雨时，极近杜翁当年心迹："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先生一旦越出中国，放怀天下，思接寰宇，虽一样是满目苍茫，满腔悲悯，却别有无限渺远、高旷、超然的心事，有豁然开朗的大会通、大参悟、大希望，对世界、宇宙满心感戴、赞叹，对人类诗意般的信念沛然而生：

根据当代宇宙学家的说法，自从大爆炸以来，宇宙已经存在一百五十亿年。如果把这么长的时间浓缩折合为三百六十五日的宇宙历，要到九月十四日才产生地球，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十点三十分才出现人类，人类的全部文明历史还不足十秒钟。因此，从宇宙的观点看，一个世纪的时间曾不足以一瞬，即使宇宙与人类最后都要毁灭，从现在看，以后的路还长着呢。我总相信，宇宙花这么长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总不是为了要毁灭它。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妙哉斯言。

先生在中国设坛开讲全球化，正是"1492 年哥伦布远航美洲使东西两半球会合"之后五百年，先生称之为近代世界全球化的开端，其间经过"国家力量的伸张，民族利益的碰撞，宗教的传播和文化的渗透"以及"局部力量的会合而引起的冲突和融合"，先生称之为"慢吞吞的全球化"。

1991、1992 年先生先后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太平洋学会哥伦布远航美洲大陆 500 年纪念会上，首先正式提出全球化（“在中国，可能是我，最早在 1991 年提出‘全球化’概念。我在《世界知识》和《科技导报》上撰文提倡‘全球化’。”（李慎之：《全球化与全球价值》)，并定该年为当代全球化的“元年”。

先生指证，当代全球化发轫于二十世纪末向二十一世纪过渡期间若干历史、政治、科技、经济和文明领域同时或相续出现的重大变化。“从 1989 年柏林墙的坍塌到 1991 年苏联的瓦解，到 1993 年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和 1994 年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倡议的纷纷出台，可以说是这样一种转折的分界线。”“世界上人口最多、领土最广的国家——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几乎同时卷入了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大潮”。“而在思想的领域，就在这几年，信息的传播已经可以以无间隔的速度到达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

“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全球性的问题在蔓延。……第一次真正的全球性的时代已经到来，全球化的过程方兴未艾。”

至今我还能记得他那特有的充满哲理的排比句：地理的全球化始于哥伦布的航行，科学的全球化始于牛顿的力学，思想的全球化始于法国大革命，经济的全球化始于资本主义，信息的全球化始于电脑网络。他对信息的全球化给以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苏联的解体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了一个封闭社会的结果。

——任东来：《“一个具有世界眼光的爱国者”》

先生深切了解文明的脆弱、人性的局限和历史的多变，他在倡导全球化一

开始，就对被“裹胁”进入“加速全球化”的中国发出告诫，全球化决不仅仅是良辰美景，“它不但会带来融合与和谐，还会带来磨擦与冲突，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血与火的斗争，是生与死的抉择”。

有人类原罪、世界末日和最后审判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世界，曾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创造转化的现代文明推广到全世界，又将殖民扩张、帝国主义、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各种文明、各种宗教之间的冲突带到全世界。一百多年来，在尼采、斯宾格勒、汤因比眼中的西方危机已经扩张为布热津斯基、保罗?肯尼迪、小阿瑟?施莱辛格、缪塞尔?亨廷顿眼中的全球危机。

先生是长期高度关注全球危机的中国人。

先生知道，中国的危机是世界危机的一部分。

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最大危机存在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意识形态战争，人类几度濒临共同毁灭的绝境。

1955 年 4 月 1 日，爱因斯坦与罗素以及布立奇曼（美）、鲍威尔（英）、约里奥?居里（法）、英费耳德（波）、汤川秀树（日）等东西方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同签署了一份宣言，致信美、苏、中、英、法、加六国政府：“这个世界充满着冲突，而使一切较小冲突相形见绌的则是共产主义同反共产主义之间的巨大斗争。……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感情上并不是中立的，但作为人类，我们必须记住，如果东方和西方之间争端的解决，对于无论是共产主义者还是反共主义者，无论是亚洲人还是欧洲人或者美洲人，无论是白种人还是黑种人，都能给以可能

的满足，那末就决不可用战争来解决这些争端，我们希望东方和西方都了解这一点。……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末，摆在你们面前的就是普通死亡的危险。”

人类应再次庆幸，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冷战嘎然而止，核战威胁急剧减轻。这最终应归功于有一千多年东正教传统和近八十年极权主义痛苦经历的俄罗斯人民的良知和理性，这个高尚而伟大的民族为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和巨大牺牲，永远值得人类铭记。

现在该轮到中国来向世界表明，它那五千年的文明与一个世纪的磨难，同样可以转化为救赎与复兴的教益和智慧，而且可望光大为神意般地降临于中国的天命。

先生有幸越过二十世纪，他的经验和智慧得以在当代全球化的世界大放异采。作为最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之一，先生早已作出判断，中国决不能再次自外于世界潮流，决不可再次对立于西方主流文明。中国二十世纪悲剧性、灾难性的历史抉择（或被抉择）是所谓“走俄国人的路”。当斯大林主义的血腥纪录已经大白于天下、毛泽东的本来面貌逐渐浮现，当无数冤魂要求历史的公正审判已经成为所有人的精神重轭和道德责任，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留给世界的仅仅是一堆堆历史的废墟时，先生率先站到了当代全球化的入口处。

先生以抑郁、忧伤的笔调描绘了全球化的危机。除了“环境污染的全球化，人口爆炸以及由之而来的移民问题的全球化，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扩散所造成的对全人类的威胁，恶性传染病、毒品买卖与犯罪活动的全球化基至垃圾处理都成了全球化的问题”之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我们这个星球上正在发生所谓‘文明的冲突’，全球文化的大危机”。

我们宁可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这种讨论，它代表着全世界的现代化已经走到了一个阶段性的转折，需要清除几百年来以西方价值观（或者说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为主导的工业文明的积弊，开创出一个新局面，使人类能过上比较合理、和谐、安全、健康的生活。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先生特别告诫国人：“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是：在中国即将完成自己的转型期的时候，世界也正进入一个更大的转型期——由工业化时代转入信息化时代。换言之也就是中国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刚好与世界的价值观念大混乱的时期重合，它们同样出现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人类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有道是：‘过了一关又一关，关外还有山连山！’”

两千余年间，中国尽管战乱频仍，封闭停滞，但始终没有贯通西方历史的宗教“圣战”，儒释道从未出现不共戴天的仇杀征伐；但现代专制主义强加于几代中国人的意识形态灾难，却远胜于西方世界。中国人至今远未摆脱专制主义意识形态的毒害和禁锢。先生曾深受意识形态之累，深知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为祸之烈，先生是冷战结束、全球化时代来临之际，第一个呼吁及早“确立”全球价值

的中国人。

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不但经济、科学、技术已经趋向全球化，而且各国的国家制度，从而各国的价值也将趋向全球化，这就是全球价值。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虽然没有从学理上系统论述全球化（这种论著已经汗牛充栋），但他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避免再次误入荆棘之途，为中国顺利走进全球化所必须具备和完成的历史前提，为中国可望对世界全球化发挥正面影响并做出特殊贡献而作的总构想，却极富原创性。在漫长的迷茫和黑暗之后，先生“极高明而道中庸，致广大而尽精微”，以中国独有的圣贤心地、圣贤德慧、圣贤胸襟和圣贤气象，对中国与世界之路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观照和综摄。

中国要自信、从容、尊严地融入世界全球化，要在全球化进程中复兴和光大中国文化，首先应自觉扫除二十世纪的历史残渣和思想迷障。

必须批判和反对东方的、亚细亚的、中国的专制主义；

必须辩识和剔除专制主义孕育的蒙昧主义和奴隶主义；

必须警觉和抵制极端民族主义和“亚洲价值观”；

必须全面改革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基本社会结构；

必须及早进行公民教育，建立公民社会、公民国家；

必须彻底摒弃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专制主义灌输和强化的世界观、历史意识、思维模式、生活方式，重新开始“新民”、“新人”和现代启蒙运动。

“在今天全球化的大趋势中，作为世界最大的单一民族的汉族，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势必要引起世界其余部分的恐惧和厌恶。我们只有认真推进政治改革，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博得其他国家的尊敬与爱戴。”（李慎之语）

在二十一世纪世界全球化时代，所有民族都有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事情特别紧迫，特别重要。道理是再简单不过了，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世界绵延最久而又辐射甚广的文化。如果中华民族不能促进全球由混乱走向有序这个伟大的历史过程，它就必然要延迟甚至促退这个过程。是非厉害，洞若观火。……对外国的各种疑惧与期待，我们也可以作一断语：中国经济和文化振兴，如果走的是沙文主义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祸；如果走的是全球主义的道路，那就一定是中国之福。还可以再加一句：‘中国之祸肯定是世界之祸；中国之福肯定是世界之福！”（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世界对中国的“疑惧”，只能由中国自己去消除；世界对中国的“期待”，也只能由中国自己去实现。

先生曾再三辩析、再三证明，自由、民主、人权、宪政其称谓和形式固然先由西方人创造，却已被西方和全世界五百年来的文明历程和中国一百年来的历

史教训反复证明，它们是源于人类本性、符合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民族的利益和精神的普世价值，是现代文明、现代社会得以维系和发展的基石。中国应以真正“泱泱大国”的胸襟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坚决摒弃已彻底破产、对中国已无任何积极意义可言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坚定地与西方主流文明合流。——这是现代文明世界对中国殷切的期待。“二 OOO 年六月二十七日，一百零七个国家的代表在波兰集会并且发表《华沙宣言》，表示‘承认被普遍接受的民主价值’。这在我们年青的时候是不可想像的，只是其中十分触目地没有中国、朝鲜、越南、古巴这几个国家的名字。”（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确立》）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正脉的儒家学说，最积极入世，最谙沧桑变易之道，并以“人之初、性本善”对人性有永久的信任和寄望。中国悠久丰富的人文主义和民本思想，不难认同和践行西方现代普世价值，“中国文化积累如此丰富。我可以说，无论什么现代思想都可以找到本土资源。……现代的民主政治固然不同于中国古来的民本思想，但是只要‘下一转语’，就未始不可以通到‘民有、民治、民享’。”（李慎之：《中国的自由主义资源——李慎之、杜维明先生对话录》）

亚洲文化中本来就有趋向民主的传统，亚洲在民主化方面已取得很大的进步，而且已具备发展民主并且使之超过西方水平的条件。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中国哲学所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民本政治”，亚洲的民主哲学思想并不亚于西方。

——李慎之：《亚洲价值与全球价值》

“我是一个一直做着‘中国文艺复兴之梦’的人。我希望而且相信，中国文化首先是中国哲学会在下一个世纪有一个大的发展。不过我认为要做到这一点，中国文化自己必须要下一番去腐生新、推陈出新的工夫，要能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首先是要能包容、消化以至超越与自己对立了这么些年的西方文化。”（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我生七十九年，虽然阅历不广、学问不深，但是也总算亲眼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冷战的起讫，多少也能看出一些世界历史的轨迹来了。

推原起始，也不必远溯古老的历史，我亲身经历的一九四一年八月罗斯福邱吉尔发表的《大西洋宪章》，正是由英国和美国两个近代宪政思想发源国家的政府首脑所宣扬的四大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宣言就是这一大转变的发端。它不但高高举起了一面旗帜，而且指出了一个方向，一个甲子以后的现实，便是其一次又一次的收获。

《大西洋宪章》由阐明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作战宗旨而发展成为战争胜利以后成立的联合国组织及其宪章与以后一系列的文件，给全世界确立了民主的全球价值。

民主政治最有利于发展经济却是当代世界的共识。最新的例证是美俄两国总统二〇〇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在华盛顿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的话：“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社会是保障公民丰衣足食的最有效的工具。”无需说明，所有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个论断。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先生自称，“我觉悟所花的时间比陈独秀还长，一直到老年才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没有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无产阶级民主；没有旧民主，也没有新民主，民主就是民主’”。（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民主起源于人对自己天赋权利的要求，世界各国历史上大概都有很长时期的由自称权力来自于天或上帝的专制君主或者少数有特权的贵族统治人民的时期。所谓启蒙，就是普通人对自己的权利的觉醒，所谓民主就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而排除专制者或者特权者的统治。从一七七六年美国《独立宣言》以来，一七八九年的美国《人权法案》和同年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就都确认：人生而自由，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一个公民都享有言论、写作和出版自由，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有迁徙权、居住权、私隐权，结社权、有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诉的权利，以及以后不断增补扩大的各项权利，写入宪法，成为治理迄今为止最大的人类群体--民族国家绝对不容侵犯的原则。

联合国成立以来已经制定了《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其他的许多宣言和文件，对保障人权都有明确的规定，凡是联合国会员国都有义务遵守。

民主起于人权，人权起于人要求自由的本性，是民主还是专制，是真民主还是假民主，只要以人民是否享有上面所说的权利一对照，就一目了然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人行正义的潜能使得民主成为可能，人行不义的倾向使得民主成为必要”。民主的底线在于防止“人行不义”，民主的精义在确保个人自由，民主的最高价值则在于“人行正义”。“因此，从人文价值讲，在民主成为全球价值的时代，个人立身处世的标准应该是全球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互动（或者用中国人爱说的话来说，是辩证的结合）。这种全球价值都是指的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民主价值。再进一步，还有全世界范围的民主，这才是最后的全球民主价值。马克思所说的‘英特纳雄奈尔’虽然大概不能实现，康德所说的‘世界政府’则大有实现的可能。”（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在先生看来，西方主流文明宣扬和推行的现代普世价值，不仅不是洪水猛兽，不是西方的阴谋，也不是高深难懂的天条，而是真正有益于中国、值得中国认同和接受且完全能够实行的基本智慧和基础规则：

对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来说，在二十一世纪要实行民主比起二十世纪来要容易得太多了。第一是因为全球化的形势，可以说是“万方民主逼人来”。坚持专制难免被鄙视，被孤立。第二是因为已经有百十来个先进国家树立了民主的范例，要学习并不困难，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有关实行民主的概念和实践，已经有丰富的积累而十分明确了。

——李慎之：《全球化有赖于全球价值的确立》

毛泽东曾在腥风血雨的文革中期说了一句至今令老辈国人毛骨悚然的“名言”：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这种把“封建法西斯”发挥到“顶峰”

的“慨而慷”的“万丈豪情”，已行将被代表人类自由和尊严的时代精神彻底埋葬。先生已经无限欣慰地道出了历史的真谛：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不实行民主，行吗？

索尔仁尼琴曾经指出，关于共产主义学说的“先进思想的黑风是上个世纪末从西方刮来的，它折磨和伤害了俄罗斯的心灵，俄国为此付出过6,600万条生命。”索氏呼吁苏俄领袖们：“把这种意识形态给他们吧，让中国领导人在短时间内以此自豪吧！他们将背起不可能完成的国际重负，让他们呼哧呼哧地去拖吧！让他们去教育人类，去负起全部沉重的经济负担，一个古巴一天就需要100万，更何况还有包括南半球各大陆的恐怖分子和游击队。……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条道路。”

历史已反复表明，像俄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能长期尘封在一种纯粹外来的、僵化的、绝对而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王国里。只有最狂妄、最冥顽不化的疯子和白痴，才拒绝认同数千年的民族主流文明和同样数千年的世界主流文明，才对世界文明神意般的交汇融合缺乏起码的谦卑和热情。

先生与所有中、西往哲时贤一样，非常清楚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等现代“普世价值”并非西方文明所独具，而是植根于各种文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以及全人类的本性之中，植根于“人类同源”、“地球是圆的”、“只有一个地球”以及全球伦理的惊人趋同等文明起源、依存和发展的世界性物质－精神结构；同时，他也非常清楚，由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原罪、恶、私欲、本我……），

由于地缘、种族、信仰、文明特性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这种“普世价值”充满了各种内在和彼此之间的张力和矛盾，未必能单独支撑人类文明的殿堂、实现世界永久和平。

先生高度评价西方有识之士对世界文明危机的深刻洞察，对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以及为解除这一危机所作的努力，衷心欢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向中国文化、中国传统请教的新姿态，同时，先生以“君子求诸己”的东方风范号召国人：“我们中国人应当欢迎，应当支持这种努力。但是，我们不应当等待或者单纯依赖他人而不首先自己从事这种努力。中国人不能做‘待文王而后兴’的人”。

在先生的民族自觉和文化自信中，参予和融入世界全球化只是矫正中国命运的必需，而中国真正的使命却在于：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原则上相信，作为中国文化核心的中国哲学，能够给当今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全球的文化危机开出一条最好的解救的道路来。

在我们要重新建立道德秩序的时候，中国不会是孤立的，因为这正是全世界都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候。我们只希望中国自己的道德秩序能够建立得比较早一点，能够对人类史上第一次建立的全人类的秩序——全球秩序作出比较大的贡献。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古来的圣贤，都是东方人文精神的坚守者，也无不怀有深邃的“天命”意识。中国的真精神、真生命向来崇奉天人合一，人神不二，道不远人，其亘古不易的信念是：古往今来神人共建，天长地久物我同心。

先生暮年，一面高度关注国家命运，一面沉潜于“天命”的无言世界。生命的存在、心灵的境界与世界的悠久无疆，与人类的“大命”彼此融通，在先生生命终点达到一种圆满而光明的境界。

先生曾痛诋中国文化传统为专制主义恶魔，同时坚信，一旦解除专制主义，中国文化无比丰富的价值将彰显于世。而一经放怀全球，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立即全幅呈现在先生目前，直令先生看到绝大多数传统主义者都不曾看到的壮观景象。冥冥之中，中国古老、伟大而神奇的文化精神，穿越五千年时空，在一位八旬老者身上凝伫、韬光、辐射、辉煌。

先生以“返身而诚，善莫大焉”的中国君子之道，诚心“折服”西方对中国的“深刻的观察和尖锐的批评：中国面临的各种危机中，核心的危机（THE CORE CRISIS）是自性危机（IDENTITY CRISIS），中国正在失去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性（CHINA SENES）。

先生坦承，重建中国的“自信”、“中国性”，“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也极艰巨的工程”，但是“如果中国人不能继往开来，建立上承旧统而下启新运的道德秩序，我们就将既不能实现现代化，也没有资格在全球化的未来世界上占有一个尊严的位置”。（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正面融入全球化是中国三千年大变局后重新收拾旧山河、重新上路的伟大

征程，先生殷殷希望中国以“天行建，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自励，重新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

我倒是相信中国成为世界上一个领袖群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其重要的前提是必须好好地继承中国传统中的大国风范，真正以“泱泱大国”的标准约束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深刻反省极左思潮，恢复人的尊严，继承并且发掘中国的文化的优秀传统，包括五四精神，来一个再启蒙运动，这是中国现代化在思想上的必要前提。

——李慎之：《虚骄之气——中国的隐忧》

而哲学在唤醒人的觉悟方面所必须依赖的历史背景、文化色彩、民族感情，却决不是外来的东西所能代替的。惟一的办法是“开发”我们本来的“中国心”。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如何摆脱目前这种“上无道揆，下无法守”的状态，是中国走向未来，走向世界的首要问题。

十多亿人民，如果自己不能立，又谁能立之？这是非得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本源、最精华的东西不能为功的。中国人历来还认为知识的东西必须以道德为根基。所以孔子说“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一点真精神。我们如果能依靠中国传统，结合当代学术，求得一点真知，使中国十多亿人民人人能在道德上卓然自立，那就可以说已经给东方文化争了气了，也就可以说给目前这个道德普遍低落的世界作了很大的贡献，而给东西文化的融和共进打下了一个结实的基础了。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天将降大任于中国，此其时也。中国古代长期被人（主要是中国人自己）诟笑的“大而不当”的“空疏无用的学问”（诸如人极、皇极、太极等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宇宙的天地人神的形上伦理哲思），在先生眼里，正是中国所独有、当代全球化所亟需的世界性、现代性文明资源，二十一世纪更高明、更重要的普世价值。

“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事实上也就是以中原文化为核心与中国大地上各种各样文化通过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达到协调融合，终于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的历史”。（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伏尔泰、狄德罗、魅奈、汤因比等西方贤哲也早已承认，中国两千多年来在政治上、文化上把亿万人民团结起来，这是“无与伦比的经验”，对于当今世界的分裂冲突是一种“绝对需要”。

西方曾经过近千年宗教蒙昧和政教合一的中世纪黑暗时期，一场回溯希腊、罗马文明的文艺复兴运动，不仅复活了基督教的内在信仰精神，而且为西方

乃至全球提供了近代和现代文明赖以存在的普适价值。中国为何不能经过两千余年专制统治后，通过一场先生梦绕魂牵的中国文艺复兴，不仅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创造性转化”，而且有效地矫正和补救西方基督教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现代危机，为人类的共处和全球价值的确立、丰富和升华开出新路。

在“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八十年、文化大革命“批孔”三十多年后，先生旗帜鲜明地指出：“孔孟之道历来被认为是一种政治－伦理哲学，它可以成为我们重建道德秩序的精神支柱（俄国人就羡慕地说‘要是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孔夫子就好了’）。”

西方全部现代文明，都是以人为目的，以人为本，以个人为中心，直到“人权高于主权”。先生明确指出，这正是中国文化区别于神本主义的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如果说，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摆脱了中世纪宗教蒙昧主义、神本主义而发现和确立了“大写的人”，中国则可能在全球化人类命运的整体关怀中，将自己两千多年囿于专制统治而压抑变形的人文主义的辉光普照于世：

当代世界亟待重建的正是人的价值系统，因此中国哲学并不因其过去的缺陷而丧失当前的意义。

只要是悟道得道的中国人，不论是和尚道士还是寒儒尊官，也不论他一生的遭际是荣华富贵还是艰难困苦，他都感到自己是在实现自己的价值，而从中感到一种乐，总是能以微笑来面对惨淡的人生。

在今天这个充满紧张焦躁、危疑忧惧、孤独感、疏离感的世界上，难道不正是中国哲学教人如何安身立命的时候了吗？

中国哲学之所以能给人伟大的道德力量，正是因为它把个人的价值源头归之于生命源头的宇宙。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中国的多数哲学流派——不论是儒家、道家、佛家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都要求个人把社会责任置于一己的私利之上。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从今天的各种各样的矛盾与混乱中自拔自立。

康德这样的思想家认为自己毕生的奋斗目标就在于提高人的地位，然而正是中国的先哲把人的地位看得最高。《孝经＞上说：“天地之性人为责”；《礼记》上说：“人者天地之心也。”这就是说，人是宇宙的自我认识、自我觉悟、自我发展。人的尊严、人的价值来自于天地；来自于宇宙；人当然有能力拯救自己。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被哥白尼推到宇宙边缘的人，被达尔文分解到细胞的人，被弗洛伊德贬到只剩下本能的人，在 21 世纪必将重新回到宇宙的中心。而在对人的价值重新发现过程中，中国哲学可以有重要的贡献。

——李慎之

“从 1949 年到 1979 年，中国实际上作过‘全盘西化’的绝大努力。即使全盘西化不可能，它也做到了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文化大革命中强调两个‘决

裂’，更是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没有做到过也许是今后也做不到的。”（李慎之：《当代中国的文化问题》）“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式的“全盘西化”（全盘俄化）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值得总结和记取的历史性教训。也许那是历史的宿命，但绝不能再将这一惨痛的教训带到二十一世纪，因为它完全有悖于堂堂中华的古老智慧和大国风范，也有悖于世界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任何情况下，中国决不能再对“全人类的（也就是全球的）主流文化（市场经济、民主、法制）故意唱反调”，更不能与任何其他反对世界主流文化的逆流亦步亦趋。中国曾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虽然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征战杀伐，但中国先哲崇尚和平、宽恕，反对暴力和仇杀的恻隐仁慈之心，却是滔滔者天下皆是的当今世界上，比“不以暴力抗恶”的消极和平祈愿更有普世意义的人类相处的基本伦理：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和”而不是“争”。虽然实际上大化流行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竞争以至厮杀，但是中国从来追求的是“和”，而且总是从“争”中看到“和”。因此，就是到了中国文化确实足以领袖群伦的那一天，它也只能是促进世界上各个民族、各种文化互相包容，互相吸收，互相学习，以求得共同超越，而不会是因为受了一百年“西风压倒东风”的气非要再来个“东风压倒西风”不可。只有“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才是中国文化的真精神。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尽管秦始皇不惜“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而有“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的可悲结局，蒋介石不惜花园口决堤以阻日军而酿成为祸中原的黄泛

区，毛泽东更不惜发动大炼钢铁运动、几乎砍遍神州赤县以逞一己之私，尽管中国从古即今都有“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征服自然”、“向地球开战”、“不怕天、不怕地”的狂妄愚昧，但中国几千年来，从哲人到黎民，真正信奉的仍是悠久的农耕文明启示于中国的东方信仰：“参天地之化育”、“上下与天地同流”、“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而合谐”。一袭“天地君亲师”，道尽中国价值系统的妙谛。

作为中国文化之本的中国哲学从“天人合一”出发，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有机体，使人在大化流行、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中安身立命。这是一种完全摆脱了神话与迷信的哲学，一种完全与当代的广义进化论相契合的哲学。正是这种哲学引起西方科学家的惊叹，被认为是神奇的“东方神秘主义”。但是，我们的先人是通过冥想、参悟、亲证而达到这样的“极高明”的境界的。中间并没有经过足够细密的验证与推理的过程。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中国哲学的本原是忧患意识（以区别西方宗教的怖畏意识）”（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致朱光烈先生书》）。历史、文化、疆域、人民如中国者，苦难、悲剧、忧患如中国者，最大的不幸乃是罔顾天命，背离使命，沦落到物类的田地而不自知。

全球化敞显于中国，命运终于开始垂怜多灾多难而孤苦无助的中国，天命终于开始垂顾饱经忧患而自强不息的中国。先生集一生的磨砺、才华、德行、忧思和聪慧，以其“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精深修持，以其博古通今、融贯东西的气势和胸怀，已经遥望并描述了中国的伟大使命：

一个人往往并不能准确地知道他所处的时代在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但是我们这一代可以确切地说，我们是处在２０世纪到２１世纪的转折点上，是处在第二个千年到第三个千年的转折点上。不但如此，我们也确切地知道是处在全球化的起点，处在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前进的门槛上。我们可以为自己躬逢文明转换期而自豪，但是我们更应该认识到我们面临的挑战是严重的，而且是极其严重的。

——李慎之：《从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

这样一来，讨论了 100 多年的体用之争也可以解决了：以全球化的普遍规律为“体”，以中国特色为“用”。中国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自己的长处，参加为全球化的过程明道立法，制礼作乐，也就是确立规范的大业，也应当可以算是明体达用了。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的最高信念是“人者天地之心也”，也就是说，人是秉承着神圣

的使命而出现在宇宙中的，蜗牛角上的蛮触之争不过是过眼烟云，创造今后万代继起之生命者是“大事因缘”。从上个世纪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问题，在中国争得个不亦乐乎。其实从中国哲学来看，只有全人类的共性、全人类的发展才是真正的“体”。把这样的观点贡献给未来的世界，才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可能作的最大的贡献。

——李慎之：《辨同异 合东西》

中国真有一天实现了现代的愿望，成了世界头等富强的大国，也还是要继承中国古人所艳称的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的态度。这种态度确切地说是协和万邦的态度，是今天世界上所缺少的，也是中国真正可以贡献给世界的，是未来的多元化而又全球化的世界的胶合剂，是足以改变这个世界自古以来服从的“武器先进者胜”这条规律的置换体。西方是可以取代的，只要有哪一个或者一群国家真能做到“言为世则，行为世法”！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只要我们能直探中国哲学之本源，而综观各家各派之会通，就可以发现中国哲学以宇宙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总系统的思想是一种最少武断、最少迷信而完全能与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相融和、相发明的哲学。按照人类进化的原理来推测，人类必将逐步发展出对宇宙、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的生命、对人的认识能力与行为能力的一系列共同观念，中国哲学将是世界各种哲学中最能与之相包容的哲学。

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活提高、物欲横流所造成的危机以后，人类必然要进入一个在精神上自我调整的时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哲学的复兴将是一个大趋势，而至少在中国和中华文化圈内，在十亿人的范围内，中国哲学将在百年陵夷之后重新展现其价值。人们将在其中得到寻根究底的智力上满足，也得到安身立命的道德上的满足。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

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可以把下面一段文字看成一位大器晚成的中国先知留给世界的遗嘱。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份没有个人私心、民族偏见和时代局限的精神宣言，一份人类之子的钧天祝祷：

不管任务多么困难，我有三点信心：一，我相信：天地生人，或者说宇宙用几百亿年的时间进化出人类来，不是为了要毁灭他。二，我相信：既然连最低级的细胞都有自组织的能力，人类社会也一定有自组织的能力。孟子说："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乱。"顾炎武总结了中国历史上风俗由敝坏而转为淳厚的经验，得出结论："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实际上历史已经多次证明这一点了。三，虽然追根究底起来，人类发展出的科学与技术是产生今天的文化危机的重要原因，但是我相信：科学技术还会继续发展，最后能给人以力量来解决它自己造成的问题。

地球只有一个，人类本是一家。"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的日子总是要到来的。

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还有真正伟大的任务要去完成呢！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先生憧憬、陶醉其中的中国使命，也是中国文化不断慎独、不断反省、不断调适而上达的过程。先生敢于为中国向世界许下如此崇高、伟大、神明的诚诺，是因为他始终秉持着东方的谦和与自知，谨守着人类的本真和良能，透识着世界精神发展的辩证历程，以及对中国的困境和危机怀抱着的深沉的警惕：

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特别丰富的经验而应当对全球化作出更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不过我们也要明白，我们的经验主要属于近代以前，也就是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对近代的国际社会我们还是一个后来者。……为了积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总结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一方面还要加倍学习外域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也就是两者之中有利于建立全球秩序的成分。

我们要扪心自问：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市场经济正确运行的规则和民主法治的真话学到了吗?学到可以从心所欲进行再创造的地步了吗?难道我们真的已经把列圣先贤教导我们的把社会责任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道德规范践履躬行，“无丝毫亏欠”了吗?

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我们自己还正在危机中挣扎，我们还远远不能说已经看到了通向彼岸的桥梁，我们甚至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迷失的“自性”，我们又如何能在全人类面前夸口呢?是好样的，只有自已做出榜样来。

谁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谁就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哪个民族能“先天下之忧而忧”，才是真正的“先进民族”。

——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中国要走正道，就只有老老实实地向人家学，而且要承认迄今为止学得还很不到家，虽然已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这只能使我们更加虚心，更加努力地学习，不但要学透它这样做的原理，还要建立它得以这样做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够我们临深履薄学几十年的了。

——李慎之：《中国应取什么样的风范》

由先生这样一位博古通今、融贯东西且经历了现代中国的苍黄风雨，对中国道路和世界趋势有深广而清晰的视野和坚定而慎重的判断的思想大家来为中国的全球化抉择奠定一个总原则和大方向，由先生这样一位“思接千载、精骛八极”的现代圣贤来为中华民族精神与灵魂的安顿和命运与使命的归宗立开山之功，避免中国在二十世纪几度误入歧途的历史悲剧，推助中国与西方正面遇合，造福中国与世界，这是不幸中国之大幸。

为先生放言冒一句，以当代中国对世界无何估量的份量和意义，以先生对中国与世界安危祸福无与伦比的集大成的体证与思考，先生在中国文化、中国思想和中国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已越逾先生敬仰推戴的近现代诸先贤梁启超、陈独秀、胡适、熊十力、梁漱溟、顾准……，而与托马斯?阿奎那、马丁?路德、让?

加尔文之于宗教改革，但丁、彼特拉克、达?芬奇之于文艺复兴，哥白尼、伽俐略、牛顿之于科学革命，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之于启蒙运动，歌德、席勒、赫尔德之于狂飚突进，弥尔顿、雨果、左拉之于社会正义，洛克、休漠、斯密、柏克、康德、托克维尔之于自由精神，索洛维约夫、别尔嘉耶夫、梅烈日科夫斯基、舍斯托夫之于白银时代，托尔斯泰、甘地、马丁?路德?金之于非暴力主义，吉拉斯、索尔仁尼琴、萨哈罗夫、戈尔巴乔夫、哈维尔、昂山素季之于反抗极权主义……为伍，进入了人类文明创新和自由先驱的不朽行列。先生是中国三千年历史托命、一个世纪的整体经验、教训献给世界的东方之礼，昭示中国文化复兴和伟大使命的时代先知。

先生抵达人类思想和精神的巅峰时，已届暮色苍茫的八十高龄。

先生多次申言，“我曾经是一个相信自己已经掌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结果不是只成为一个笑柄了吗？”多次申言，“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只是年纪大一点，经验多一点，感受深一点”，多次申言，他是被吓破了胆的人，“战战兢兢、认认真真地编假话、讲谎话，老老实实地做一个两面派。我的心情灰到‘他生未卜此生休’的地步，对自己的最高要求就是做一个明白鬼。”多次申言，“我以过来人的身份可以说我们这一代是被误导了。我们这些革命党对民族是有罪的，看到年轻人都感到人格有愧，抬不起头来”；多次申言，“直到晚年，才反省到自己一生走了弯路，我的经历唯一可以自豪的是当过二十二年右派，这迫使我思考了很多问题，用孟子的话说是‘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但我损失的时间无法弥补”；多次申言“现在重要的不是唉声叹气，而是认真地做启蒙

工作，首先是启遮蔽自己耳目之蒙，启闭塞自己心灵之蒙，只有自己觉悟了才能觉人”；先生只是 55 万右派人士之一，十数亿中国人之一，芸芸众生之一，“学而知之，困而知之”者之一。但他在古稀之年开始觉悟，自行精神变法而一发不可收拾，直到耄耋之年而达不可限量之境，遥承中国圣贤人格而充实光大。他在中华三千年变局与西方五百年全球化之间，在一世纪的风雨之后，“以提高人的地位为平生志愿”，为中国思想的创化精进、为中国精神的复兴光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谓中国二十世纪守墓人、二十一世纪敲钟人。

当你目击末世苍黄黯澹之时

便是你驻足新纪元曙色微茫之日

二百余年来，西方列强的尖船利炮率先戳破了中国专制帝国的残旧面纱；西方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启蒙运动和社会政治革命最终经由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向中国输出的激进主义，却造就了一个反西方的专制帝国，这是二十世纪世界历史中地缘政治、地缘文明最罕见的孤例。

迄今为止，西方对中国依然充满茫然、疑惧和期待。无论基督教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还是极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西方，都没有、也不可能真正破解、征服和拯救中国。西方依然没有发现真正理解、同情、接纳、善待、欣赏、推崇中国的理由，西方对中国的命运和使命依然一无所知。

迄今为止，中国的世界形象依然严重失真、严重扭曲。中国闻名于世的依然只是秦始皇及其长城、兵马俑，只是成吉思汗及其金帐汗帝国，只是大清天朝帝国及其义和团，只是鲁迅及其“阿 Q”、“狂人”，只是毛泽东及其文化大革

命，只是拒斥“和平演变”、煽动“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及其“六?四”血案，只是四千年“吃人”的传统，只是古董、武术、气功、乒乓球，以及非典。

迄今为止，中国在精神上依然只是西方现代世界的偏远地区，中文只是世界少数民族方言，中国依然是一个令人困惑、费解、望而生畏的国家，甚至如马克思所称，依然是先进、文明、法制和人道的“欧洲的直接对立面”，封闭在一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里，实行“普遍奴隶制”和“腐朽的半文明制度”，是“总体保守”、“总体反动”的顽固堡垒。

西方不可能真正体察中国的困境、积怨、焦虑和危机，也不可能真正领略中国的气质、抱负和理想。中国拥有东、西方两百年间遭遇、冲突、激荡的复杂经验和深重教训，中国经历了东、西方集大成专制主义最野蛮、最残暴、最反动的黑暗时代，中国悠久博大高明神奇的真精神至今隐而不显。

“9?11”事件极其恐怖极具象征意义的末世图景，已经直观地将人类文明的危机呈现于世人，由西方文明单独导引的现代人类已经继冷战之后，再次面临共同毁灭的“极”点，“生”还是“死”的终极追问再次怵目地高悬在世界上空。

如果继续固执于上个世纪从西方输入的激进主义，中国将再次步入歧路，不仅无补于世界范围内的乱象，而且将因为再次背离中国的使命而再次遭受“天谴”式的惩罚。

中国的另一种可能、另一种前途同时存在。

一旦挣脱专制经济制度的束缚，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令世界瞩目，完全可

以预期，一旦突破专制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禁锢，中国将以不逊于任何民族的速度和规模，全面实现现代化。中国正在从二十世纪的巨大阴影中脱身，中国正在临近历史的破晓时分。

三千年来，中国在“上帝缺席”的苍茫时空中，独自发展出伟大的人文主义精神；两千年来，中国“充实光辉”、“大而化之”的圣贤人格，在征战杀伐的无道天下依然生生不息；一千年来，中国在漫长窒息的专制王朝之外坚守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肆悲愿；一百年来，中国历经腥风血雨，厄运交错，民族生命与民族文化空前分裂；六十年来，中国的祸患和灾难几乎达到人类能够忍受的极限，中国几乎沦胥到了精神灭绝乃至民族衰飒的境地；直到毛泽东死后，直到现代极权主义的原始淫威滥施殆尽，直到所有中国人从史无前例的浩劫里挣扎还世，直到苏俄解体、东欧易帜，直到西方现代思想和中华传统精神先后初照神州赤县，中国才终于开始驻足于历史的分水岭，终于可望且能够以自己博大精深的德慧、修齐治平的成人成贤成圣之道、“协和万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的崇高理想，正大、坦诚、自信、尊严地遇合西方主流文明和全球普世价值，实现中国现代复兴，造福人类，毕其功于一役。

欲改善、矫正和升华自身形象，中国可谓任重道远。

首在“恢复中华”。复兴中国悠久博大的精神与信仰体系，将人立于天地间，国立于天地间，立于天地永恒、无限与神意之间，立于形上与终极世界。

恢复中华人神共存共建共荣结构。世俗国家、政权、政党放弃信仰宰控，

还精神、灵魂与民，恢复人天合一、对话、感应的祭祀传统。对天地、祖宗、先烈先贤实行法式大祭，建立中华忠烈堂和先贤祠。

重建中华道德伦理世界，倡行贤良品格、君子风范和圣贤气象。摒弃一切专制、等级、特权、尊卑、贵贱，鼓励慈悲、同情、怜悯、兼爱等人性之美善高尚。

继承中华人文风教，表彰变法维新，允公允大，厚古惜今，重申人禽之辨、文野之辨和生死之辨。

无神论、唯物主义和包括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内的一切西方思潮、理论与学说，只能作诸子百家之一，不享有宪法强制推行之特权。所有研究、信奉者只能以平等、独立和自负经费、时间方式对待之。非意识形态、非政治化是中国人文精神恢复与发展之必要前提。

重建中华史学统绪，公开、公正、理性、客观研究、批判、反思与总结二十世纪。恢复历史原貌，还前人以公道，辨清善恶是非。开放一切禁忌，解除所有摧残人民身心自由的钳制，恢复天赋人权的全部内涵与外延。一旦中国人在法律和事实上达到西方社会已经享有的各种精神、政治、文化、社会、经济权益，中国面貌自然为之改观。

千条万绪，中国形象只能将世界公认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与自己古老而独特的智慧与经验相结合，摆脱东、西方数千年专制毒化和人性恶素的伤害，才能赢得举世尊重。

即使在风雨如晦、内忧外患的晚清，先知辜鸿铭就为中国形象与世界辩论不休；即使在黑暗无边的文化大革命中，熊十力、梁漱溟、唐君毅、陈寅恪们仍

然深信中华民族贞下启元、否极泰来的一天终会到来；即使在 1989“六?四”屠杀、中国世纪之交的“尼古拉一世”时期，刘宾雁、李慎之、何家栋、王若水、胡耀邦、赵紫阳、李锐、胡绩伟们还为中国的政治变革和精神出路殚精竭虑。

一个如中国这样几乎吸收了全世界正义与邪恶的庞大民族，一个对人类负有天定影响和责任的生命共同体，不可能总是选择荆棘之途，不可能长久拒绝仰望星空倾听内心良知召唤，不可能永远走不上通向历史破晓时分的正道。

共和是比帝国更为古老的历史形态。自公元前 841 年周代庚申元年始，中国式共和概念已有近三千年之久。雅典、罗马共和制是西方现代宪政共和的历史先驱，诺夫哥罗德则是俄罗斯千年专制社会的例外。共和制与专制帝国的对峙与较量并最终取代后者，是近代世界性潮流。

中国二十世纪曾呈现出“走向共和”的基本趋势。第一共和——辛亥革命建立的“中华民国”结束两千余年帝制，使一切封建专制在法理人心上不能公然复辟，成为现代中国的元点，具有伟大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奠基性。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对“中华民国”法统的颠覆式继承发展。海峡两岸执政当局都曾表达过某种共同意愿：签署和平协议，结束国共内战。未来两年左右，辛亥革命 100 周年前后，如果上述意愿成为现实，那么中国就有可能抵御帝国诱惑，转上共和之路。第一共和（中华民国）和第二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前后相续的“共和”历程，实行一次涵盖性超越性的新综合，建立起东方与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现代共和国，不啻是中国的最幸，也是人类的一大福音。然而，与超级帝国的巨大而致命的诱惑相比，这个几代仁人志志殚精竭虑殒身奋斗的理想，中国命运唯一顺天应人的正道，一切矢忠中华愿意生死与之的

国人的理想，却是如此微茫、难以凑泊的彼岸。这是当下中国最令人沮丧、悲观和绝望的事象。

李慎之先生晚年徘徊在对中国两种抉择的思虑之间。六年过去，中国内外演变的世局，不断验证了这位先知的忧患，弥深至大，绝非启示良多。

西方绝非尽占真理，美国亦危机不浅。它们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未必全都真实、正确。但六十年间一以贯之的帝国潜型和日益强悍的帝国意欲与令世界戒惧不宁的帝国抉择，中国自己应承担主要负责。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已然到来，我们必须遵照“反求诸己”的高尚道德和“天下一家”的伟大情怀，重新审视国家的哲学、道路和使命。殷鉴不远，苏俄帝国惨痛的教训犹在目前。“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中国已经到了又一次历史关头，——也许是终极性和不可逆转的十字路口。抵御任何帝国迷梦，转入和推进共和大义，当成为全体国人的历史性共识和不二抉择，则中国幸甚，世界幸甚。

2010 年 2 月 11 日 重庆

（全文完）

—— 原载:《纵览中国》